

志。作者特别强调:这里的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之“政治”不同于“利益政治”之所指,而是定位于、定义于邓小平念兹在兹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也是习近平再次言明的国运命脉之所系——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虽然七十年代未开启而九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去政治化进程纵然不无推进“改革开放”之意,但与此同时也在日益疏离社会主义政治。去政治化本身就是另一种再政治化,在走向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等说辞下,有意无意“复辟”资本主义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作者由此进一步指陈学界现状:如今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几乎成为美国翻版,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在师生中,更不用说在记者中恐怕早已成为一具了无生气的空壳。而这一切,对学术的健康发展无疑非常不利。综观两篇文章,前文以新闻业发展最为关键的十对关系为视角,对新闻业进行了立足于共时性层面上的客观全面的解读,对于从全局上整体把握新中国新闻业及其核心理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这篇文章则是立足于新时期新闻业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政治化”问题,展开了翔实细腻的梳理,以此厘清错综复杂的新闻众相,给新闻业界与学界勾勒出三十年新闻业发展的清晰的理路及文化地图。而这种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经纬相织,形成了对六十年新闻业发展的全面诠释——既有宏观的架构,又有微观的详细解析。作者李彬教授如此阐述自己的研究立意:期冀以更开放、更多元的视角与思路,全面审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业以及新闻学——一方面“清点”前人留下的庞杂遗产,将其置于六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脉络与数百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时空,提要钩玄,辨伪存真;另一方面,在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基础上,开掘蕴含着生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历史资源,藉以激活在当下学科建制化中显得形销骨立、苍白贫血的新闻传播之学。李彬教授的表述,也恰好暗合了本刊“新闻学与传播学”栏目始终秉持的学术风格与编辑立场,即立足于学科基础上的深入思考、立足于思想层面上的理性把握,立足于文化意义上的批判与反思。为此,先后推出李彬教授的两篇文章,一则希望助益于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二则希望能邀约更多的业界同道关注于相关问题的持续解读。

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

李彬^{1,2}

(1.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2.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新闻变革似有一种正反合的三部曲:八十年代高度政治化、九十年代去政治化与新世纪以来再政治化。文章由此政治视角审视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系列演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在纷繁复杂、众语喧哗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梳理归结中国新闻变革之轨迹、踪影与脉络。

关键词:新时期;新闻变革;社会变迁;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 G2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5)03-0001-45

鲁迅先生的话颇有深意: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说社会历史是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大地,那么任何解读即史观就如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大小通衢。虽说条条大道通罗马,但不同的路径勾连着不同的地域,贯通着不同的方向,从而形成不同的路线图。对当代社会而言,这种情形更为突出,因为不同的路线图还在展开,还在不断变化,不同于古代社会的诸多路线图或荒弃,或湮灭,而只剩若干众所周知的主干道。下面即想另辟蹊径,沿着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去探寻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之轨迹、踪影与脉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从政治角度将当代中国社会归结为正反合三部曲。“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改革前后数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高度政治化,到解/去政

治化(全能国家的消退,非意识形态化,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生活的兴起等),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1]具体说来,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初,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诸如“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等都是表征,即使强调“又红又专”,也是政治的“红”重于业务的“专”。随着阶级意识的退场与经济中心的凸显,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格局日渐消解,形成去政治化的态势,并一直贯穿当下,而尤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以来为甚。新世纪前后,伴随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变局,包括冷战结束、苏东解体、贫富悬殊、官员贪腐、生态恶化以及美国主导的一系列为所欲为的战争战乱等,一种再政治化趋势开始日渐明晰,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越来越重新趋向政治化。在他看来,“重新政治化”非指计划经济与全能政治的回归,而是说社会问题重新纳入公共领域,或成为媒体的热点话

收稿日期:2015-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09AXW001)

作者简介:李彬(1959-),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河南大学黄河学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题,或成为需要政府解决的政策议题,如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自然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至于下岗、三农、基尼系数、地区发展不平衡等更是关系重大的国家政治。2014年4月号《文化纵横》“封面选题:利益政治时代的到来”编者按写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思想生态持续发生变化。其最大特征是公共政策和利益话语争论的兴起。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与每个人的实际利益调整紧密相关,意识形态争论通过利益话语的转化,形成新的复杂组合方式。……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正式到来。但是,这种“去政治化”丝毫不影响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政治化”。

社会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制度调整、贸易政策争论、新型法律出台、审批机制简化,包括住房、教育、医疗、计生改革方案引发的广泛争论,在这所有方面,都把每个人的命运卷入其中,塑造并强化不同人群的价值分歧与阶层定位,并反之强化政治争论的断层线。^[2]

当然,以上“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并不意味着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历史发生了转折和断裂,恰恰相反,正因为主流文化以“去政治化”方式告别了对根本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辩论,传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才能进行重新配置,新的社会问题也才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实际上具备内在统一的政治逻辑,“去政治化”是“再政治化”的必要准备。就此而言,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说的各种福利政策和社会问题引发的广泛争论,如果只囿于利益群体的得失算计而不涉及国计民生的根本制度和根本道路的话,那么不仅谈不上再政治化即社会主义传统政治的回归,反而将七十年代末期开启的政治逻辑向纵深推进。不过,若单纯从社会问题爆发和社会结构僵化的角度看,仍然可以在表面上将三十余年的发展概括为如上“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

遵循这一政治理路,三十年来新闻变革也不妨视为三个类似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八十年代属于高度政治化,而高潮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仅看八十年代新闻界连绵不断的学术讨论,一方面体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专业追求,一方面也不无对一切社会主义政治传统的反思、扬弃,甚至背弃。^[3]沸沸扬扬的党性人民性讨论中,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明确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显而易见,此类观点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更是政治问题,通过改写“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新闻定位,最终取消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权,亦即取消党对人民的代表性,而塑造掌握媒体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人民的代表性。1983年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不点名地提到此事,“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随着九十年代市场勃兴,新闻传播表面上一度呈现去政治化的态势,就像某位主持人将新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冷冰冰的所谓

“知”字。新世纪以来,在日渐突出的社会政治态势下,特别是高度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汹涌泛滥,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的三重叠加,新闻传播再政治化趋势日甚一日,习近平2013年的“8·19讲话”不妨视为这一再政治化的又一鲜明标志。这里的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之“政治”不同于前面“利益政治”之所指,而是定位于、定义于邓小平念兹在兹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也是习近平再次挑明的国运命脉之所系,“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4]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七十年代末开启而九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去政治化进程纵然不无推进“改革开放”之意,但与此同时也在日益疏离社会主义政治。换句话说,去政治化并非去除一切政治,而只是去除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政治信念、政治原则,亦即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与共和国的立国之魂。去政治化不是不讲政治,而是讲特定的政治,去政治化其实就是另一种政治化。在走向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等说辞下,有意无意“复辟”资本主义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就像如今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几乎成为美国翻版,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在师生中,更不用说在记者中恐怕早已成为一具了无生气的空壳。由于这一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实为一体之两面,相辅相成,相伴相生,而这里所指的政治又主要围绕社会主义这个核心,故将二者在这里统称为去政治化。至于后面所论再政治化更不同于景跃进教授的概念,而是指新世纪以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运动与价值的全面“复兴”,这一复兴同上述“复辟”潮流针对着坚持还是背离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形成此起彼伏的交锋。另外,常说的新时期乃属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约指“文革”结束到当下,其间以十年为限的政治化三部曲也是一种大略划分,因为社会历史不可能按照十年一变的节奏展开。

以下即从政治化的路线图,勾勒三十年来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的轨迹、踪影与脉络,非常粗略,也非常简化,主要着眼于文学艺术界、学术思想界和新闻传播界等意识形态领域,未能也无力关注更为基本、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借用批评家李陀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话说:

回顾八十年代,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大了,你必须对涉及八十年代的各个历史都作一些批判性的再认识才行——不是一个历史,是许多历史,这带来难度。需要处理的,不光包括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还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思想和观念变迁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等等,你都要有一个总的观点,你才好回顾。而这点我做不到。我看的书和材料越多,就越觉得很多事想不明白,想不清楚。^{[5]249}

同样,面对三十年来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笔者也深感白云苍狗,变化万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尚无力全面把握,更难以深刻理解,而只能记下零零星星的思

考札记或片片断断学术笔记 权作以后系统考察与深入研究的点滴素材或一家之言。

一 八十年代:高度政治化

(一) 风起云涌“新启蒙”

关于新时期,有不同的话语表述和理论概括。除了“改革开放”还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人治到法治,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等。而在经济学家温铁军看来,百年中国及其社会变迁的实质,无非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6]这些表述和概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变革轨迹,自有各自解释力。比如,目前我国有几亿农民工,构成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而改革开放初,农民进城还是难得而罕见的事情,看看1980年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就知道了。如此天翻地覆是怎么形成的?前因后果,错综复杂,绝非流行说辞所能涵盖。社会学家黄平认为,至少有两项制度上的变化,促使和保障了农民工以及其他人员的自由流动。一是1980年代中后期推行的身份证。此前任何人外出都得开具介绍信,否则无处容身。二是1990年代初取消粮票制度。之前没有粮票,连一块饼干也买不到,粮票还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在本地用地方粮票,到外省市办事,还得兑换全国粮票。对此看似寻常却最奇崛的变化,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从社会历史纵深处展开分析触角,提供了同样富于启发的思路:

讨论1980年代我觉得要注意两点:一、在1970年代中期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就提出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建国以来前二十年,我们走的是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高就业的道路,对消费和工资是有限制的。调整就是放开一些限制,这也是1980年代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空谈思想解放运动,那不可能造成1980年代的局面……二、……今天我们回首1980年代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起码在思维方式上,我觉得并没有超越毛主席所说的:既要避免教条主义,又要避免经验主义这两点。1980年代主要是从反对教条主义这一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所说的思想解放运动,说白了核心也就是反对教条主义,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避免经验主义、短期效应,对于避免“跟风”、浮躁,乃至于无政府状态,这个或许注意就不够——以至于最后搞到顾准那样的另外一种形而上学——也就是所谓的“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7]

新时期以1989年政治风波为界,形成不尽相同的思想文化阶段。前一阶段如今统称为八十年代。学者王学典指出,所谓八十年代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一样。如他所言,八十年代实际上涵盖从“文革”结束至1989年,“指的是当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他认为,对这个特殊时期,用“后文革时代”更为准确^[8]。不管称八十年代,还是叫后文革时代,虽然感觉坚冰融化,春风徐来,但从社会生活到新闻传播,事实上依然处于高度政治化状态,体现着鲜

明的政治色彩与政治意味,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则更是始终“在高位运行”。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姓社姓资到包产到户,从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的讨论到朦胧诗之争与电影《苦恋》之辩,从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潮到周扬、王若水等社会主义“异化论”,从一拨一拨学潮到六四风波——八十年代的高度政治化显而易见。邓小平几次针对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更是构成八十年代高度政治化的里程碑。虽然时过境迁,但读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反精神污染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等,依然能够强烈感到这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疾言厉色,以及对任何挑战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毫不留情:

——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

——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前列……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评并没有导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相反,发展主义、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等新的理念,已经逐渐替换了从阶

级和社会形态上理解政治生活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正反双方合力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局面,他们在整体上既远离了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也揖别了年轻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无所依托而可以随意填塞的概念空壳,从而为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行排除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障碍。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核心动力,经济扩张、财富增长、利益追求貌似淹没了宏大的政治关怀,也使八十年代的诸多讨论、争议或辩驳失去热度,全社会从高度政治化趋向全面去政治化——既有对政治命题的淡漠,更有对革命、马克思、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传统的疏离,甚或背离。祝东力2014年在《文化纵横》杂志撰文,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又一个重要起点。从那时以来的经济社会乃至思想状况,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9]。下面就分别探究一下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这一嬗变。

三联书店2006年付梓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既回溯和反思了八十年代的风起云涌,又折射和隐含了九十年代的风云流变。作者查建英是北京大学七七级大学生,也就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书中访谈的诗人北岛、学者甘阳、北大教授陈平原、批评家李陀、电影导演田壮壮等,均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由于《八十年代访谈录》影响广泛,三联书店又推出一部《七十年代》,由北岛主编。该书作者之一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2014年的《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一书中有一段透辟文字:

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恰好目睹了共产主义从高潮到低潮的历史巨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比很强烈。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是“七十年代”。

我在我的回忆中说过一段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牛津版印在封底,三联版印在腰封。我要强调什么?就是这个转折点。

改革开放,前提是中苏交恶、中美接近。中美接近的前提是中苏交恶。

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招,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环扣一环。这些世界性的大事,转折点在哪里?就在1968-1971年之间。

七十年代,既是中国解围的开始,也是“文革”解体的开始。^{[10]182-185}

一般说来,八十年代的突出特征在于思想启蒙、狂飙突进,除了最具象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也广泛波及各个领域,文学艺术界、学术思想界、新闻传播界尤为活跃。用查建英的话说,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人文风气浓郁、文艺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时期”^{[5]7}。这个时期最有力的思潮和话语,就是所谓“新启蒙”。新启蒙的突出特征在于一反一正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对文革以及近现代革命的偏激反思与批判,李泽厚的“启蒙救亡变奏论”堪称代表;

一方面是对西方、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偏执向往与推崇,1988年热播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最为典型。也就是说,新启蒙一手严打“东方专制主义”,一手高扬“西方资本主义”。前者决绝得缺乏同情,后者热情得丧失理性(吊诡的是“新启”蒙恰以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为旗帜)。在汪晖看来,“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话语”或“新启蒙主义”,“由一种富于激情的批判思想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构成“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他说:

由于中国“新启蒙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着目标上的部分一致性,这个运动保守的方面成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技术官僚或者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的官方理论家;这个运动的激进方面逐步地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其主要的特点是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推进中国的人权运动,促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领域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革。^[11]

1978年,一篇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整版刊出,一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作品第一次“控诉”了文革,小说作者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大学生。回头看,作品的艺术价值无从谈起,思想内涵也很浅显,如果说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作为“拨乱反正”的先声,给人们心理带来冲击和激荡。此类反思和批判文革之作后来统称“伤痕文学”,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古华的《芙蓉镇》(1981)、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1979)、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莫应丰的《将军吟》(1979)、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等。一系列相关电影、小说、绘画、诗歌、戏剧、歌曲等也可归入其中,如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由谢晋执导的影片《牧马人》,根据古华同名作品改编,也由谢晋执导的影片《芙蓉镇》等:

“伤痕”、“反思”文学是新时期最早兴起的文学思潮,它们都是在当时“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批判和对极“左”路线的历史反思确立“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合法性,这也构成了“伤痕”、“反思”小说最为基本的叙事基础。实际上在其他文类的“伤痕”、“反思”文学中,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同样表现得相当突出。诗歌领域中的“归来者”们,大多以诗的方式结合自己曾遭迫害的人生经历,而对极“左”时期的政治历史进行痛切的揭露、反思与批判。……以散文的方式书写上述主题,从“新时期”之初如巴金的《随想录》和杨绛的《干校六记》,到新世纪以来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徐晓的《半生为人》和朱正琳《里面的故事》等作品,多有表现,刻未断绝。^[12]

1979年,一部梅开二度《重放的鲜花》一纸风行,洛阳纸贵。所谓“重放的鲜花”,是将当年“右派”作品重新结集出

版,包括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些作品重新问世,在当时引发的社会政治效应,真好似“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同样,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刊,也成为八十年代的标志性事件。这份刊物聚集的一批诗人被贴上了一个当时并非美誉的标签——朦胧诗派,其中包括北岛、芒克、顾城、舒婷等。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诗句,如同箴言一般广为流传。至于舒婷那些清新、隽永的诗篇,如《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等,更是构成当代文学最美的篇章,也折射着八十年代的理想情怀与精神境界。而这一情怀与境界更近于1974年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而与韩寒为符号的“新新人类”迥异其趣。

如果说伤痕文学是面对过去的伤悼,那么朦胧诗则堪称面向未来的宣示。由此开始,文艺界的精神触角开始伸向未来,不期然而然地呼应社会政治的“向前看”。只是“向前看”的未来并非一目了然,共产主义愿景已漫漶,而八十年代文艺与社会潮流唯一笃定的,是西方、是世界、是现代化。可惜,历史的悲喜剧往往在于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正如“向前看”后来演变为“向钱看”。当时,“新奇怪,现代派”成为文艺新潮与精神时尚,包括引发民族矛盾与政治事件的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1987),而面向未来的新潮一方面不断消解既往政治遗产,既包括“文革”极“左”政治,也包括中国革命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一方面使人天真地以为道别这些传统,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奔向未来,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了。今天,在影视、广告、画报、网络中充斥着暴露镜头,人们的视觉感官早被性符号冲击得麻木不仁,至于郭美美似的粉色幽默也已屡见不鲜。而这一切的征候,在八十年代的文艺新潮中已经隐隐显现。1979年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落成,请画家袁运生创作了一幅大型壁画,题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表现傣族欢庆泼水节的民俗风情。由于出现女人的裸体,壁画完成后引起一场沸沸扬扬的舆论风波,后以邓小平、李先念等亲临参观才平息收场。须知三十年前第一次出现女性裸体,巨大的社会心理冲击波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而此类冲击波在八十年代,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既延续着“解放思想”的精神余波,也体现着一种新的乌托邦畅想,应和了新启蒙对自由、民主、现代化等政治命题过于单纯的想象与过于简略的理解。按照黄平的分析:

思想解放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指导思想层面,要不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政策层面,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农村是要不要分田、工厂是要不要搞奖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三个层面就是文艺,从把老歌老电影拿出来——“重放的鲜花”,包括老文艺战士重新回到舞台,到新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多数的是中短篇

小说,也有电影、话剧。今天回过头看思想解放至少这三个层面,思想层面、政策层面、文学艺术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第二个层面是解决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今天仍为学者们(当时年轻大学生)记忆犹新、影响较大的,还是文化、文学、艺术这个领域,而不是前两个层面。^{[13][125]}

八十年代的学术界同样热闹火爆,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几百年的思路历程,中国十年之间就重走一遍,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到尼采、海德格尔、萨特,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大略说来,当时学术界有三股热潮波及广泛。一是方法论热。其中又分“老三论”与“新三论”,“老三论”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新三论”有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所谓方法论乃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方法这个看似科学、貌似中立的角度入手,瓦解正统意识形态及其条条道道。当时新闻学研究就以信息论为理论武器,联手刚刚引入的美国冷战学术——施拉姆为代表的传播学,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突出政治的核心价值,从所谓“科学”的角度进行消解。二是美学热。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还会对美学感兴趣,而在八十年代一度似乎全国人民谈美学,人手一本美学书。从社会心理上分析,既有人们对僵化说教的厌弃和对新潮思想的追捧,也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懵懂向往。如今,“美女”一词几如陈词滥调,而在八十年代,美还是一个羞羞答答的东西,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改革开放初,有部纪录片反映人们对美的渴望,其中有个镜头颇具匠心,抓取一位女士棉袄的下摆。当年人们穿的棉袄,外面还加一件罩衣。这位女士的棉袄虽是鲜艳衣料,但罩衣却是当时的统一色彩,西方谑称“蓝蚂蚁”、“黑蚂蚁”。纪录片抓取的就是罩衣下的棉袄一角碎花图案,配上一句解说词:“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三是文化热。这是八十年代最热的潮流,也是最具现代政治或文化政治意味的潮流,至八十年代后期达到沸点。其间又有三套丛书反响巨大,可以作为文化热的标志。

第一套是《走向未来丛书》。丛书从1983年开始出版,到1988年共出版74种(计划100种),涉及众多学科与研究领域,犹如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丛书主编金观涛是新启蒙的“精神领袖”之一,与李泽厚、严家其、包遵信号称“四大青年导师”(六四后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的严家其潜逃美国;包遵信判刑入狱;金观涛滞留香港)。这套《走向未来丛书》既应和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以及去政治化的潜流,又契合着当年追求知识、学习文化、充满理想热情的精神热流。这种精神热流被传神地浓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词里,这篇由中宣部胡平起草、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宣读的闭幕词,以诗人的激情欢呼科学的春天“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第二套丛书是中国文化书院编辑的《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没有公开出版,只作内部参考。相对于《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可以称为“走向传统丛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时代意义。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于1984年,是由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发起,海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创建的民间学术团体,主事者汤一介、庞朴、李泽厚。2014年十卷本《汤一介集》问世,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撰文回忆:

记得1985年初,我参加由汤一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亲耳聆听了海内外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羨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吴晓玲、孙长江、丁守和,以及魏斐德、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邹说等先生的演讲,一睹名家风采,得承大师警发,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这期讲习班对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14]

第三套丛书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包括四个系列,最有影响的是《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及其“姊妹篇”《新知文库》。这套丛书的主编甘阳及编委会成员,均为八十年代一批风云际会的中青年学人:刘小枫、周国平、刘东、李银河、陈平原、钱理群、陈来、阎步克……按照甘阳的说法,“走向传统丛书”是一批老年人,《走向未来丛书》是一批中年人,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一批青年人。

现在看来,上述学术界状态,无论三大热潮,还是三套丛书,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和强烈的政治关怀。所谓文化热的文化,并非热衷于风花雪月,琴棋书画,怡情养性,而是致力于葛兰西所谓文化霸权即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说白了,这里的文化、学术、方法等,归根结底都在“讲政治”。具体说来,就是以解放思想的“启蒙”旗号,全方位解构革命话语与社会主义传统,当然也包括“文革”等极“左”思潮:“当时人们反思和批判‘文革’是从三个不同的思想路向上同时进行的,这就是反思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自由主义者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思。”^[15]这种反思在理论与现实层面固然应和着拨乱反正的时代脉搏,同时也不期然而然地导致了当时以及后来一系列文化政治的偏颇与隐患,并随着时间愈发显现。

总的看,八十年代学术思想界一方面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与问题意识,著书非为稻粱谋,同家国天下的命运联在一起,如张旭东所言,“跟中国本身的文化政治问题扣得很紧,它始终是个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问题”^[16]。一方面,普遍存在的急躁心态以及忙中出错的褊狭也构成后人诟病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大家似乎恨不得一朝一夕就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一觉醒来就实现现代化。在这种心态下,对西方、对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不免失之简单、片面或偏激,全盘西化甚至成为一种普遍倾向。华裔美籍学者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里,对这种盛极一时的社会政治倾向做了综述与分析:

不仅仅是像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方是天体物理学家、刘是记者、王是作家,1987年均被开除出党——引者注)这样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每一种东西的渴望。时常会有几千人排队等候几小时看一场毕加索的画展,或是一场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或是一场米勒(Arthur Miller)的戏剧,但很少有人去参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几乎外来的任何事物都有吸引力:政治思想、社会理论、未来学、小说、戏剧、艺术、时装,甚至像可口可乐、麦氏咖啡和肯德基之类的庸俗事物。当时最受欢迎的结婚礼物是一套中文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央编译局局长这样解释公众的热情:

三十多年来,我们把西方的文化当作禁忌对待,抛弃来自西方的一切事物。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弥尔顿、萧伯纳、卢梭、巴尔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全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不知道圣经故事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无可否认,西方的影响到处弥漫,而且日益强烈。^[17]

(二) 风乍起,新闻界

新闻界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狂飙突进中一路风风火火,兴高采烈,自身的一系列变革同样此起彼伏,可圈可点。由于新闻传播深嵌于社会组织的毛细血管——“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一举一动自然无不时时牵动现实生活的每根神经。辩证地看,当时新闻界呼应时代的大背景和历史的背景,高扬启蒙旗帜,张扬主体价值,在拨乱反正、推进改革上成为引领潮流的排头兵;同时,受制时代与自身的局限,也形成另一种历史性的失误与偏差,从而留下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和命题,包括“六四”风波及其舆论导向。

关于新闻自身的变革或改革,八十年代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新闻观念;二是新闻体制;三是新闻业务。其中,新闻文体的变革尤其突出,因为新闻变革的一切动向莫不首先体现于新闻文体,无不直接落实于新闻报道。八十年代的新闻文体更是变化多端,在一步步突破单一、僵化、逼仄的文体之际,涌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报道形式,虽然有些如今已经习焉不察,甚至觉得老套,但在当时却展示着一种生机勃勃、元气淋漓的新气象。其中,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的会议报道,《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系列报道,《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的散文式报道和深度报道,《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和叶研等采访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等,都是流播人口的新闻名篇。

文体既是新闻的客观载体,也是记者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的主观框架。古人云“文以载道”,“文”既指文章,也指文体。延安整风及《解放日报》改版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针

对文以载道的“文”字,即所谓文风、文体等。所以,文体变革也体现了记者对新闻以及社会历史的认识框架发生调整。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开始招收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文革”前复旦大学新闻系曾经招收两名研究生,但未授学位),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资深记者担任导师,人民日报社由安岗挂帅,新华社由戴邦牵头(两人后来分别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和副所长)。由此,这里成为新时期中央媒体的“黄埔军校”,造就了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如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王晨、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和冯并、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刘江和彭树杰、新华社特稿社原副社长熊蕾、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李东东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希光也都毕业于此。其中,第一届的艾丰(艾宝元)在读期间完成了一部新闻业务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也是其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987年获得首届吴玉章新闻奖——中国新闻学最高奖(此次一等奖授予方汉奇先生的代表作《中国近代报刊史》)。本书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新闻报道的规律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新意与独创的解析,既是八十年代新闻变革的回声,也为新闻业务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启迪。

据广西大学新闻系黎明洁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的统计,当时新闻界与此相关的讨论计有:关于新闻散文式的讨论、新闻五要素的讨论、新闻本体与根据的讨论、新闻时效性的讨论、新闻文学的讨论、深度报道的讨论、典型报道的讨论、现场短新闻的讨论、新闻写作思维变革的讨论、新闻背景研讨会、消息写作研讨会等。^[18]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季萌以此为题,完成学位论文《新时期中国报纸主要新闻文体流变》。按照她的分析,文体变革集中于三个方面:现场短新闻、深度报道和文学式新闻(散文式新闻、大特写、体验式新闻等)。三者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使新闻的面貌为之一变。^[19]

“文革”结束后,新闻界首先大力批判假大空的报道模式,力图恢复实事求是的新闻品质和鲜活生动的文体风格。所以,一方面追求新闻的真实性,一方面探索报道的可读性,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提出的目标——“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间,八十年代初新闻界热议的“抓活鱼”,不仅推动了新闻报道求新求快,而且也改变了新闻不新的问题。随着变革加剧,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逐步开放和活跃,以及西方现代思潮及其新闻传播理论的西风东渐,新闻文体及其探求也愈发活跃,多姿多彩,古与今、中与外的各种元素交相融会,冲击碰撞,既使新闻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演变,也使新闻文体出现落英缤纷的生动局面。八十年代初,新华社社长穆青提出“新闻三论”——散文式新闻、实录性新闻和视觉新闻,在新闻界产生广泛影响,对改变多年一贯制的“新华体”起到推动作用。所谓“新华体”按照童兵等主编的《新闻传播学大辞典》的

简要定义:“段落安排仅为导语、主体与结尾三段式的消息结构形式……具有段落分明,一目了然等长处,但也有俗套、缺乏活力的短处。已有所改进。”^[20]按照刘建明主编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的详尽解释:

新华通讯社长期报道国内外新闻所形成的一种写作体式。关于新华体的特点说法不一,但这一概念在我国新闻界已流行通用。新华体的公认特点是:消息简洁,文字精练、准确,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21]

一般来说,这种文体在处理“硬新闻”上具有突出优势,也是世界各大媒体报道新闻的常规策略。然而,年久日深,这种新闻文体难免程式化、刻板化,仿佛皇家公告严谨有余而鲜活不足,或如王中先生1957年对党报的苛评——“寡妇脸”。为此,人们自然渴望有所突破,穆青也曾不断探索。这位延安鲁艺毕业的“文学青年”,多年来始终主张借鉴文学表现方式报道新闻。1950年代他就提出“新闻是一种叙事文”^[22];1960年代又指出“新闻即是散文的一种”、“散文中的叙事文”^[23];1980年代进一步主张“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24]。一句话,新闻报道可以而且应该借鉴散文笔法,如谋篇布局、描绘意境、刻画形象、捕捉细节、状物摹形等。具体说来,新闻要像散文那样讲究“立意”,创造深邃的“意境”,像散文那样“白描”等,结构则像散文那样富于变化,语言像散文那样生动凝练,记者像散文作家那样形成自己的风格等。其实回望新闻历史,注重文采,鲜明生动,也是现代一切优秀新闻报道的共同特征,如梁启超、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萧乾、乔冠华等报道评论均为楷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的报道也多见鲜明生动,而少有八股之气,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系列文稿更是挥洒自如,如“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等消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等新闻评论。

如果说穆青在理论上为“散文式新闻”大声疾呼,那么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则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范本。1982年,她以一篇激情饱满、文采斐然的消息《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一扫此类报道的陈规以及对新华体的刻板印象,见报后蜚声新闻界。郭玲春说,这篇1982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作品,是受国外一篇报道萧伯纳逝世消息的启发,其中有这样生动感人、过目不忘的细节描写:“伦敦,一个有雾的清晨。萧伯纳的府邸前聚着上百名群众,等候着这位伟人的健康报告。一位身着黑服的老夫人缓慢走下楼来,持着将要燃尽的一支蜡烛。她低下头,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而后告诉众人:‘他说,他疲倦了。’人们脱帽肃立,和这位报讯的妇女一起垂下了头……”199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散文式新闻选萃》,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序言中写道:

“这些作品从总体上说,真实而自然地再现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不加雕饰,挥洒自如,织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读着这些散文式新闻,仿佛觉得阵阵清风扑面而来。”^[25]

与此同时,富有真实性与现场感的“现场短新闻”也同样颇受青睐,理论界大力提倡,新闻界积极尝试,名篇佳作纷至沓来。《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等采写的“跳水皇后”吕伟报道,就是八十年代的一篇经典之作。在这篇报道里,记者仅用532个字就再现了跳水健儿吕伟夺魁的瞬间,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鲜活流动的画面。导语部分的特写镜头,先将读者一举带入“屏声敛息”的氛围,接下来的镜头也如吕伟跳水动作一般行云流水,一气呵成。1991年,樊云芳获得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由于标准严格,首届评选空缺一名,只评出九人,包括原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采写张海迪的原《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解放军报》记者江志顺、《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四川省金堂县广播电视台记者杨登榜等。

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城市改革、价格闯关、双轨制、官倒等问题,新的社会矛盾与现象已使单一的事件报道难以应对,从而催生了“深度报道”。深度报道同解释性报道、预测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同属一类,又称大报道。1984年以《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系列报道《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为标志,深度报道浮出水面。随后,樊云芳《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光明日报》)、罗荣兴、祝华新和曹焕荣《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上)》(《人民日报》)、“关广梅现象”讨论(《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叶研等“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向中国新闻文坛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波”^[26]。以《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为例,它将报道触角深入新闻的纵深领域,揭示了事实背后的深层背景,使习惯于“新闻是事实的报道”的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策划采写《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的张建伟、李大同,均为《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张建伟除了《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还采写了《第五代》《命运备忘录》等新闻名作,在八十年代有“中国第一记者”之誉,1991年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1993年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他是“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在校时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来不仅成为颇有名望的记者,而且还以文史作品见长,曾获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作为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编剧之一再次扬名文坛。

深度报道的出现与流行,固然源自记者主体意识的活跃——“纵观新时期报纸主要新闻文体流变,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新闻文体高度突出了其主体性:深度报道侧重记者的忧思意识,现场短新闻强调记者的‘现场’意识,文学式新闻呈现记者的审美意识……”^[19]与此同时也与汹涌不息的新启蒙热潮丝丝相扣,若合一契。八十年代可谓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后又一启蒙高潮,包括记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记者与

其说是报道新闻的“记录者”,不如说是以笔为旗的“思想者”。声称自己作品“全都是思考”的张建伟说“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季节。整个中国新闻界被新思想的光辉笼罩着,不仅我一个,一大批记者写出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的报道。《红色的警告》《鲁布革冲击》以及政论式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等等。”^[27]³⁵²⁻³⁵³从当时有影响的报道标题上就可略见一斑,如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神圣忧思录》《自由备忘录》《阴阳大裂变》等,这些气吞山河的“大字眼”让人觉得,记者仿佛成为高高在上布道说教的神甫牧师了。在透视留学生问题的《第五代》里,记者张建伟干脆直截了当地站出来,直抒胸臆: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一座大熔炉,“第五代”即使全部学成回国,是不是已经被“美”化的人,成为“资本主义化”的人?除了学识,他们会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重新锻造?这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到底接受了什么观念?这些观念能被视为“资产阶级观念”视之如敝屣吗?(1986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这些发问流露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启蒙诉求,远远超越新闻报道的专业藩篱。报道中还提到西方的四种现代观念:“人人争当经济人”、“竞争的唯一标准”、“被视为耻辱的帮助”、“货真价实的高节奏”等,此类主张和鼓吹都成为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先声,为九十年代后的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心理播下了观念种子。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还数《人民日报》记者罗荣兴、祝华新和曹焕荣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上)》: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

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最近分别在上海、东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讨论会上传出信息:下一批经济起飞、进入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行列的,很可能是泰国、马来西亚……

中华睡醒的巨龙该惊起了!

60年代初,毛泽东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实现现代化,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可惜,后来的政治运动走上了一条缘木求鱼的歧途。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历经了多少次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民族振兴之路——改革。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激昂旋律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历来有在紧急关头奋起的非凡凝聚力。

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87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这篇报道获得1987年全国好新闻特别奖。借用张建伟的一个说法,“深度报道,发展到《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已经很难再称之为报道(尽管它们写得很精彩),简直就是一种‘精英启蒙’了”^[27]。不言而喻,此类报道同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精神节拍相互应和,俨然如出一辙。正如季萌在其学位论文里总结的:

从大量深度报道中不难看出,记者主体意识的高扬和大量主观介入正是深度报道的灵魂所在,但它以精英的姿态君临新闻报道之上,使它的使命再也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传达信息,而是对民众进行启蒙——这既构成了深度报道的重要特征,也成为深度报道受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首先,深度报道与新闻“短、快、活”的本质属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深度报道出现,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新闻现象,时过境迁之后,举国“深呼吸”(张建伟)的局面不复存在。

其次,深度报道与新闻重事实轻观念的本质属性相违背。深度报道淡化新闻事实,强调启蒙批判,主观色彩浓郁,个人感情厚重。用事实说话是新闻的本质属性,而深度报道的深刻性应该反映在新闻事实的深刻性上,而不是观念的深刻性上。^[19]

与“短平快”的现场短新闻和“深呼吸”的深度报道并驾齐驱的所谓文学式新闻,有报告文学、散文式新闻、大特写等。尤其是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成为沟通启蒙精英与社会大众的一座桥梁,许多作品一问世都如“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让人感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报告文学是以文学手法处理新闻题材,以真人真事为报道对象的新闻文体或文学体裁。这种文体或体裁集新闻性、文学性或政论性于一身,能够容纳更广泛、更深入、更细致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而成为中外一流新闻人钟爱的报道模式。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再现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法美记者合写的《巴黎烧了吗?》以及普利策新闻奖的一系列特稿作品等,都属于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佳作。以中国为例,新中国成立前的《西行漫记》(斯诺)、《包身工》(夏衍)、《饿乡纪程》(瞿秋白)等,也无不成为新闻史上的名篇佳作。2014年七一前夕,《人民日报》刊出报告文学《曙光中的足迹——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再次让人领略这一新闻文体的独特魅力。河南大学新闻系年轻学者张珂就此撰文写道:

《曙光中的足迹》以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在刘集的传入、学习、保护、献出为线索,以细腻的史料,用四个篇章娓娓讲述了早期共产主义者陈独秀、陈望道等译介《共产党宣言》,鲁北农民刘良才等接触、传播、誓死捍卫《共产党宣言》,刘学福“一门三英”践行《共产党宣言》,刘世厚40年如一日守护和献出“《共产党宣言》”(首印本误印为“共

党产”宣言——引者注)的故事。随着这本革命小册子的传播和沉浮,读者不仅重温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而且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如何点亮中国劳苦大众的心灯,赢得千百万老百姓的认同,从而化作移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最终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的传奇。^[28]

八十年代后,由于启蒙思潮的不断高涨和强力推进,作为新闻与文学联姻的报告文学也呈汹涌澎湃之势。以1978年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为开端,一时间涌现了一批名作。《哥德巴赫猜想》报道了数学家陈景润痴迷科学、不懈钻研的事迹,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动,学习科学文化蔚然成风。1981年,《中国体育报》记者鲁光在女排集训地,深入采访二十多天,完成一篇《中国姑娘》,引起广泛反响。《光明日报》记者理由的《李谷一与〈乡恋〉》(1980),同样扣人心弦,令人难忘。《乡恋》是一部电视风光片的插曲,咏唱三峡风物,抒发缠绵心绪,现在看来只是一首抒情歌曲,而八十年代却由此引发争辩。因为,李谷一用轻声、气声唱法演绎歌曲内容,同字正腔圆的风格颇异其趣,让人联想起旧中国的灯红酒绿,上海滩的纸醉金迷,故被视为靡靡之音,甚至黄色音乐,李谷一也被称为“李丽君”,即邓丽君的翻版。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春节文艺晚会,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在观众席上。当服务员把放着电话点播条的茶盘端给他时,他一看是《乡恋》,便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端来一盘,一看还是《乡恋》,如此三番五次,等第五盘端来时,吴冷西掏出手绢,擦了擦汗,说了声“播”!于是,这首“禁歌”就此风行开来。理由的《李谷一与〈乡恋〉》,即围绕这场风波叙述。虽说八十年代以来以港台流行音乐为先导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流行文化乃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但诸多理由似的新启蒙记者及其报道对这一潮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八十年代还有不少报告文学,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赵瑜的《强国梦》等都曾风行一时,犹如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文章,“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文学式新闻的繁盛,既有社会环境日渐开放的精神滋润,又有新闻记者内在创新的主体冲动;既受到外来新闻观念的刺激,又源于自身新闻传统的创造性生成。七十年代末,新华社记者李竹润以笔名“黎信”,在《解放军报通讯》《光明日报通讯》等内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新闻学的文章,短小精辟,言之有物,诸如细节、故事、背景、直接引语、别具一格的导语等报道要素,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风靡八十年代的、兼容文学和新闻的“新新闻主义”,如美国记者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以及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等,都对我国记者及其文体带来相当程度的冲击与影响。以当时“体验式新闻”为例,198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徒步跋涉368天,重走长征路,一天一篇地发表了《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成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位走完全程的记者。与此相似,《武汉晚报》记者范春歌1989年骑车穿越西部采访,行程四千余公里;1994年又只身进行中国陆疆万里行;2000年重走郑和路,走访郑

和下西洋的国家,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为此,她1995年获得全国首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同时获奖的有现任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1998年又获得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同时获奖的有现任新华社总编辑何平。

八十年代的新新闻主义不仅影响了新闻界,如季萌所言“新时期,部分由于‘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影响,有意识地运用文学手法进行新闻写作成为记者的追求。散文式新闻、大特写、体验式新闻等样式,借鉴了文学优美的文字、动人的细节和灵活的结构,深受读者喜爱。”^[19]而且也影响了文学界及其作家作品。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周同宾的《皇天后土》、陈燕妮的《遭遇美国:50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刘肖等的《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安顿的《绝对隐私》等“口述实录”,就明显借鉴了新新闻主义的新闻元素。拉美左翼记者、《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答新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时谈到的一点,有助于理解八十年代新闻与文学的联姻:

我认为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区别愈来愈小,特别是当我提到新闻而主要是想到报道、提到文学而主要想到故事的时候。两种体裁都从同样的现实中吸取营养,都要求同样的经验和对职业的同样驾驭。我认为两者是同一种才能的结果。现在我认为,过去也一直认为,我想将来我也永远认为自己(在一般意义上说)既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此外,我还认为,作为小说家,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来自我对新闻工作的爱好、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和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这为我培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没有这种感受力,任何小说家也不可能成功。当然,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而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29]

报告文学为代表的新闻与文学联姻之势,九十年代以降依然风行不衰,不仅左右新闻文体与报道风格,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南方周末》《财经》《三联生活周刊》等,而且也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漾起层层涟漪,形成当今广受关注的“非虚构”热潮。刘鉴强的《天珠——藏人传奇》(2009)、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010)、曾维康的《农民中国》(2012)、季栋梁的《上庄记》(2014)、阿来的《瞻对》(2014)等,以及《人民文学》杂志2010年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并在年度人民文学奖中增设两个“非虚构作品”奖等,都是近年来这一潮流翻涌的夺目浪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对新闻业务的强调本身也是去政治化或再政治化的一个节点,这种强调转移了记者与读者的注意力,从原来的政治辩论与政治宣传中抽身出来,后续对专业主义、新闻独立、新闻自由、新闻法等问题的讨论才可以顺利展开。另外,深度报道和报告文学的兴起,也暗示八十年代的新闻人开始有了作家式记者的特征。这种状况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逐渐脱离原有政治轨道,从文化干部转变为专业精英的结果。与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兴起的

“扒粪新闻”一样,这些突显个人能动性、观察力和解释力的作品,客观上为专业主义的兴起和新闻记者独立意识的增强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新闻记者的社会美誉度得到提升,增加了社会向这个群体赋予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权力的合法性。在八十年代特定的文化政治氛围中,这样的美誉度和合法性构成了国家放权的前提,也为九十年代大规模的产业化做好了准备。

如果说仅从看似专业、中性、形式化的新闻文体角度,就能透视如上诸多政治化的社会意味,那么作为社会政治的直接推手,整个新闻界更是同八十年代波涛汹涌的高度政治化潮流息息相关了。比如,1980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起一场人生观大讨论,主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规模和影响不亚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思想讨论由《中国青年》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引发,得到全国各界广泛关注,不到一个月,编辑部就收到读者来信两万多封。“潘晓”来信涉及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困惑迷茫,如文革中落难的高干子弟,一旦恢复社会政治地位,就弃她而去,这些困顿挫折,使她苦闷、彷徨。“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来信既有对“正统思想”的质疑和反思,也流露出一种“失魂落魄”的精神危机。来信提到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等意识,可以说已经不自觉、不经意地显示了功利化的社会趋势与时代动向,正如韩毓海敏锐指出的:

改革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水平,而且深刻地触及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重新塑造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因此,当我们今天感触社会伦理的过度私人化的时候,应该想到潘晓的“主观为自己”曾经在80年代何等鼓舞人心。^{[13][143]}

(三)《河殇》之殇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高度政治化意味着“六四”风波达到顶点,那么之前热播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无疑属于其间一大新闻标本。

同文学艺术界、学术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类似,八十年代新闻传播界的政治意味不仅十分浓烈,而且愈演愈烈。王蒙在其自传中,对“一位大先生”——刘宾雁及其报告文学《人妖之间》的剖析,为此提供了生动而深刻的案例。“这位先生的许多作品都引起麻烦,但是《人妖之间》却是顺风顺水,而且威力足可以使反面传主毙命。这是由于,第一,他批‘文革’,也是大方向的正确性;二是他在作品一开始的地方,虚晃一枪,先写了县委田凤山书记……此先生后来去了一些省份和地区,每去一个地方,他都要写一些东西,将那里的领导班子划分一下,谁谁是改革者,谁谁是冥顽不灵的官僚。这样到处闹得鸡飞狗跳……他只承认一种模式,就是人与妖的模式,其实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

式。”^[30]而诸如此类的新闻文本在八十年代可谓比比皆是,虽然意识与潜意识中体现了一种强烈而又含混的改革开放冲动,但在去政治化或再政治化的过程中难免“连孩子一起倒掉洗澡水”。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存在两种南辕北辙的政治方向,一是他反复强调、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是他严厉批评的、坚决抵制的自由化倾向。如果说后者在新闻理论上的代表是“人民性高于党性”,那么实践上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当首推电视节目《河殇》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研究员的分析:

80年代的后期,走在民族思维前端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内省式”的观照与思考,确实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前进的:自省-自卑-自责。1988年春节前后由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起的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和这年夏天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热播,正式将80年代反思意识带入意识形态领域,发展为对社会制度选择、社会发展方向、国家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建构。“球籍”讨论事实上成为一次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现实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思想动员,当时高校里政治化气氛日渐浓厚。而《河殇》在中央电视台的反复播出,更使生发于大学校园和知识界的政治思潮具有了一种官方背景而进一步被推向高潮。自省-自卑-自责的逻辑到这时已发展为一种对于传统与现存秩序的颠覆性的语境,为随之而来的政治冲突准备下了思想舆论氛围。^[31]

作为1988年数次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可谓八十年代“新启蒙”与文化热的大汇流,并借助电视媒体的强大传播能量而使之达到高潮或沸点。换句话说,八十年代各种文化政治思潮冲击回旋,逐渐升温,最后几乎陷入狂热或迷乱,而《河殇》就是这种热流旋转的新闻标本。《河殇》播出后,既在国内掀起热潮,也在海外引起热议,既得到精英赞许,也得到高层推崇,天下争说,万民竞议,掀起一阵火山喷发的“河殇热”。《河殇》一共六集,包括“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导演夏骏是刚刚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撰稿人皆为文化热的风云人物——苏晓康、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等。苏晓康时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师,“六四”后去美国。远志明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后来也去美国并皈依基督教。王鲁湘是文化学者,仍主持电视文化节目,如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河殇”一名就由他拟定。所谓“殇”,乃指没有成年而夭亡,而据《河殇》主创者的看法,“黄河文明恰恰是由于早熟而陷于停顿。停顿便如同死亡。已经衰微而不得更新转化,则是一种更痛苦的,半死不活的‘夭亡’”。^[32]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文化热的基本思路与总体倾向,是把新中国前三十年定位成政治专制如“十年浩劫”、经济停滞如“崩溃边缘”以及社会混乱失序、文化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并将这一结局归因为中国文化的愚昧落后,包括数千年的封建主义和所谓异化的社会主义。所以,唯有彻底否定

这一切,全方位移植欧美的现代文明,包括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意识形态等,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这套逻辑不仅是知识精英的信念,而且也形成文艺界、思想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共识,《河殇》不过是这一共识的集中体现。在《河殇》的高谈阔论中,中国一切现代化视野中的问题均源于内陆的传统文化,黄河、黄土地和黄皮肤更是成为落后的符号、封建的象征,推进现代化就得告别这种黄色文化,进而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化——西方文化,如同胡适告诫国人的,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头彻尾认错并全心全意学习西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3]因此,《河殇》的主题虽然在于批判和否定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而其主旨却在于新启蒙的核心价值——“补课论”,也就是李零概括的“文革”后的流行看法是,“中国应该反封建,而不是反资本主义,我们只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才有资格谈资本主义”^{[10]107}。比如,《河殇》以诗化的文字和煽情的解说告诉我们: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善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纵使它有千年的珍奇,今天也是难免玉石俱焚了。

最后一集“蔚蓝色”结束语,更以象征性的诗化语言表达了作别黄土——否弃一切中华文明的思想意愿,抒发了拥抱海洋——全盘西化现代化的政治情怀: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就在《河殇》热播之际,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批评和质疑,如杨振宁和李政道。杨振宁说: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

这三个传统即“龙、长城和黄河”都批评得一无是处,认为如果不把这三个传统抛弃掉的话,中国就没有希望,可我认为这是大错的。^[34]李政道也认为: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河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创业也能得到子孙的尊重。^[35]也许是旁观者清,港台学者对《河殇》的宏大叙事及其政治意味,看得更清楚,也更清醒。台湾《天下》杂志发行人殷允芃,就在《经济开放不是万灵药》一文里写道:

首先,它表现出来的政治意味太过浓厚,似乎已先有一个预设的“政治的框架”,也因此让人觉得它的推论显得太过急切,可信度不高,似乎是为赵紫阳的经济派在思想、理论上找寻历史文化的支撑点,这使得原本极好的构想大打折扣。

其次,它的立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而且文中提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工业文明、商品经济时,似乎是带着一种狂热的崇拜。……批判和反省是必要的。但批判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河殇》一文中表达的希望中国大陆能再富强的“急切”,虽令人感动,但也令人担心,今日的大陆是在“病急乱投医”。……中国是要现代化,但现代化是否就等于全盘西化? 这问题值得深思。^[36]

“六四”前夕,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儒将刘亚洲去看望国家副主席王震,进门后听到王震正大发雷霆,便悄声问王震女儿怎么回事,答曰:老爷子在骂一个“和尚(河殇)”呢(《刘亚洲战略文集》)。这位延安时代统领有名的359旅进驻南泥湾、新中国成立后又出任农垦部长开展更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改革开放初曾执掌中央党校的开国元勋,如何痛斥《河殇》暂且不论,仅看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不仅堪称一种对《河殇》言简意赅的总结,而且也可明了“新启蒙”的政治意味与政治价值“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10]154}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王学典从文化史的角度指出: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一代青年,与五四“新青年”一模一样,“把东西问题归结为古今问题,也就是把文化上的东西方之别归结为文化上的古今之异,而古代已经过去,今天正在展开,所以,中国文化只能走向灭亡”^[15]。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河殇》的意义不仅在于由中西文化的对比所呈现的一种王小东所称的“逆向种族主义”,这部高度政治化的纪录片更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勾画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图景。虽然今天很难有机会重温这部作品,但在日后中国全面回归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河殇》的思维一直是中国精英的主流世界观。一方面,中国的传统被视作进步的桎梏和启蒙意义上的糟粕,而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现代则是应该追慕和亲近的对象;一方面,中国广大的内陆乡村及其人群、文化被视作落后和应该抛弃的对象,而沿海都市与知识精英则成了

进步方向和未来发展模式的集中代表。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文化想象,对中国三十余年发展道路所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总的看来,以《河殇》为标志并以其做结的八十年代及其“新启蒙”、“文化热”,既如查建英形象描绘的,乃属“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文化主调也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37]79};又如甘阳简要分析的,“八十年代有几个特征,一个是经济改革不是当时知识界的 discourse(话题),而且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没有人谈这个经济改革,觉得是很 boring(乏味)的事情。第二点是人文科学为主,第三点是西学为主,绝对是西学”^{[37]196};更像祝东力犀利解剖的:

启蒙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环境,这决定了它严重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启蒙主义只反对国家、政权和暴力对人的强制,而回避市场、资本和金钱对人的强制。解构专制政治,为资本逻辑开辟道路,这是一切启蒙主义的特点。这种只反政治强制,不反资本强制的观念,在1992年以后深入人心,成为市场经济的思想前提。启蒙主义的第二个局限,是培育了一种殖民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经过80年代的洗礼,在中国人心中,西方成了文明、富裕、智慧的人间天堂,成了人权、法治、自由的理想国。500年血腥的殖民主义历史不见了,相反,这500年成了传播文明、科技和贸易的历史。而中国,包括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诸文明前列的中国,包括它的山川、风土、人情,在一些人眼里都成了专制、黑暗、愚昧的象征。^[38]

二 九十年代:去政治化

(一) 商人对诗人

如前所述,新时期的政治无论怎样化来化去,总是针对着社会主义的政治而展开。那么,去政治化是怎么一步步展开的,其中的思想逻辑何在,社会意义何在?下面不妨先看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面试博士考生,一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高才生”前来应试。想到对方是经济学出身,教授随口先提了一个常识性问题,希望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视野:请列举十部经济学经典。没想到,考生只勉强举了两三部就卡壳了,而接下来的一幕更令人意外:

教授:为什么没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呢,那么有名?

考生:哦,《资本论》属于政治经济学,不属于经济学。

第二个案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冯象,在一篇小文章《下一站,renmin大学》里,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

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

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 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 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 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做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 People's。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 renmin。^[39]

第三个案例。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研时,有位新闻界同道用心良苦地劝他说:能不能不打“马克思”的旗号,而改用“学术化”的旗号。其中的潜台词无疑是,马克思属于政治符号与意识形态,而当下学界讲究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学问。

第四个案例。某报采访了十位时尚人士,据称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英雄,体现了时代的希望和方向。其中有位新闻名人,侃侃谈及一个中外新闻学闻所未闻的高论:走了好几年的路,才认识到记者只是观察、记录、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干预世界。出发点和目的都不是……新闻的核心还是一个“知”^[40]。

从以上两个社会案例和两个新闻案例中,当不难感知去

政治化的意味。第一个小故事,堪称去政治化的一个生动插曲。闹了半天,原来政治经济学不算经济学,而只有去了政治的经济学才叫经济学。问题是,去了政治的经济学真的只谈经济而不讲政治?是不是亚当·斯密只关心经济而哈耶克不关心政治?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经济学奠基人李嘉图的代表作就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一出版,更引起全球轰动与热议。第二个故事的去政治化意味同样一目了然。国号叫人民共和国,军队称人民解放军,党中央机关南海影壁上赫然写着“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大学却变成英文中莫名其妙的 Renmin 大学。与此相似,“为人民服务”蜕变成“为纳税人服务”,作为共和国鲜明政治主体的人民蜕变成中性化亦即去政治化的纳税人。第三个故事让人不由想到国统区、地下党,马克思主义竟成谈虎色变的禁忌话题,而且一提马克思,就是政治化而非学术化。然而,看似悖论而实则合乎逻辑的是,某些不讲马克思的所谓学问又体现着一望而知的非马、甚或反马的意味,去政治化原来无非是另一种政治化。第四个故事则更是荒腔走板演绎了去政治化的逻辑,且不说中国新闻界一向明确宣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价值,即使英美新闻学也念念不忘社会政治功能,包括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内在联系。总之,如果说高度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政治,均围绕邓小平念兹在兹的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去政治化其实是去这种方向,而这种去政治化的趋势、潮流或潜意识起于八十年代,兴于九十年代。

上节谈到,八十年代的社会政治一直“在高位运行”,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政治,还是自由化的政治,始终风烟滚滚,风雷阵阵,直至酿成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波,故称高度政治化。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与凌志军合著的《交锋》一书,也算为这段政治对决留下一段纪实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文本,尽管全书具有鲜明的去政治化色彩。而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全民经商,热浪滚滚,举国下海,热气腾腾,人们一度似乎不再关心政治讲政治,而只是一门心思发大财。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高度政治化直接呈现为思想启蒙、狂飙突进,那么九十年代的去政治化则明显形成市场主导、多元分化的格局,甚至市场本身也好像成为去政治化的标志。“顽主”王朔的一句名言,集中传递了一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取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天津作家蒋子龙七十年代写过一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后来被责令修改,理由是不能以“机电局长”为核心,而要多写“工人群众”,修改完已到“四人帮”垮台,这就是“改革文学”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后来改编为电影《钟声》。作品与电影塑造了一位国企领导乔光朴的形象,展示了一个大型国企上下一心,扭亏为盈,赞扬了厂长参加生产,工人参与管理的社会主义企业关系。而就是这位模范厂长,却在九十年代一篇《乔光朴堕落记》的小说里被枪毙了,因为他变卖国有资产,吃喝嫖赌,亲手瓦解了这家国企,造成当

年的工人兄弟全部下岗。这个结局让人想起2009年吉林的通钢事件,由于国企改革引发大规模对抗性冲突,通钢集团新任总经理被工人殴毙。下面也从文学艺术界、学术思想界和新闻传播界,对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作一简要回溯与反思。

若从社会表象看,八十年代更展现着浪漫化的精神追求,九十年代更凸显着现实化的世俗趋向。用不尽准确的比喻说,八十年代犹如诗人,九十年代好比商人:诗人耽于幻想,商人工于算计;诗人激情洋溢,商人理智刻板;诗人听起来一惊一乍,商人看上去一板一眼;诗人气吞万里如虎,商人小桥流水人家;诗人心向辽远天空,商人脚踏坚实土地……这种世俗化趋向及其分野,也体现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文艺走势中,如琼瑶言情小说、金庸武侠小说的走红,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等闲适作家的流行等,都使精神化的文学作品蜕变为世俗化的文学读物。这些读物在八十年代是难入法眼、不上台面的,当时才俊哪个不自诩西方古典与现代的追星族,再不济也得是拉美爆炸文学、米兰·昆德拉等。而随着市场化、商业化风起云涌,琼瑶、张爱玲、杜拉斯、村上春树等小资作家与读物纷纷抢滩登陆,成为文化消费的时尚。当然,九十年代也不乏优秀作家和作品,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就认为:“在当代,张承志是一位追求激越情感的作家……他在90年代初期出版的《心灵史》肯定是当代散文写作中的一部奇书……当代散文的伟大奇书,汉语写作因此而有它闪闪发光的那种质地。”^[41]但不可回避的是,文学艺术总体上已经丧失了社会影响力与精神感召力,尤其八十年代的“向内转”潮流,更使文艺作品在日趋关注内心世界与个人情感之际,日趋小众化、精英化,也就是自我边缘化,从而为九十年代的世俗化腾出广阔空间。1990年代初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以《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为标志的贺岁片,均属九十年代社会文化嬗变的表征。至于余秋雨《文化苦旅》成为流行读物,他本人也在媒体上成为明星与偶像,以及大量《上海宝贝》等“身体写作”以及隐私揭秘的“口述实录”等,更是凸显了小资化、消费化、娱乐化的文化潮流。于是,在新的社会风尚冲击下,文学艺术无可奈何地滑向德国汉学家顾彬描绘的境地:

90年代文学从多方面呈现出一种社会性转向……市场经济和消费越来越多地决定了生活和私人的思想。知识分子以及作家失去了以往作为警醒者和呼唤者的社会地位。他被排挤到了边缘,在过去的理想丧失之后,一时还找不到新的非物质性的替代品……“生活就是现在”,这是以消费为导向的“都市新人类”带来的消息。“现在”,这是西方式贪得无厌的中国变种:我们想要一切,而且是“当下”就要。这种“新状态”在90年代末是新一代“流浪文人”的极端……以肮脏为导向的书写尝试可以这样来概括:没有理想,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甚至没有一种他们娱乐于其中的都市的感

觉。^[42]³⁶⁰

对于九十年代的这种去政治化状况,消费民粹主义者喜欢将其包装成“普通百姓”借由消费选择而对强权的挑战。然而,“小时代”的文化症候所显现的社会结果却恰恰相反,当年年轻人沉醉于消费文化以及亚文化带来的虚幻快感时,他们与时代政治已经渐行渐远。难怪有美国学者将浸淫在新媒体技术中的年轻人称作“最愚蠢的一代”。尤其看似悖论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随着虚幻的文化选择越来越多,社会的结构反而越来越僵化,年轻人的上升途径变得越来越狭窄,如“蚁族”、“屌丝”、“草根”等流行语所示。

面对如此文化背景与精神氛围,八九十年代之交几位诗人相继自杀,自然被解读为一种时代性的精神危机。其中最常提及的,当属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按照海子好友、诗人西川的说法,“海子是农业的儿子,他迷恋泥土,对于伴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的某些东西,他自然伤感于心”^[43]。在海子周年祭的日记里,诗人苇岸也写道“海子含着泥土,来自大地的深处。他是民间的儿子,具有和谐的自然启示的诗人……”^[44]而海子的校友强世功教授对此的感悟,更有一位政治学者的深远气象: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拥抱西方的时候,只有海子“孤独一人”歌唱中国……2001年,海子与食指同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去世那年创作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早已不胫而走: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进入九十年代,学术思想界也不像八十年代那样风风火火,似乎一夜之间也失去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登高一呼、四海景从的精神魔力。如果说八十年代看上去是“热风吹雨洒江天”,那么九十年代则好像“冷眼向洋看世界”了。比如,针对八十年代思想先行而学术滞后的状况,九十年代恰恰以学术为号召,学术规范和学术史的讨论更是高扬学术的旗帜。当此时,“学者”、“学人”取代了“理论工作者”的称谓,学问家陈寅恪取代了思想家鲁迅,李泽厚称之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再如,相对八十年代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九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强力反弹,除了持续火热的“新儒家”思潮,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意识也开始萌发。九十年代初,费孝通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文化自觉演讲,甘阳在《读书》杂志上通过费孝通《江村经济》反思八十年代学风等,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产生广泛影响。以曹锦清教授2000年以来一印再印的《黄河边的中国》为例,其中展现的已是纯然的中国关怀、中国理论、中国表述了。而类似问题意识与自觉意识在一代学人身上都日益明显,《小镇喧嚣》作者吴毅博士在其学位论文里就写道:

我开始感受到,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些生活在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 and 思维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地域的和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所思所想实在是存在着一定距离。日后的研究使我认识到,这里的西方化不是一种借鉴和拿来,而是一种不自觉地被遮蔽和被替代。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触中国的事物,但是,现代化中潜移默化的文化和学术殖民却已经使我们这些人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的眼光看待、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经验,乃至这一经验本身也已经被西方化,然后,这种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经验”又被用来论证实质上也是西方化了的“中国理论”。^[45]

1994年以《读书》杂志为阵地,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犹如八十年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或人生观大讨论,既折射了九十年代的思想流变,又从精神价值层面隐然透露了新世纪以来重新政治化的先声。这场讨论是在市场大潮涌起的背景下,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精神价值失序深感焦虑和忧心的反映和反弹,恰似人生观大讨论是对功利化、世俗化潮流的预感与预言。讨论虽然刺激了社会神经,但由于市场已然成为主宰,高谈阔论的精神、思想、价值似乎“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实际、实惠和实利则“似曾相识燕归来”。查建英感叹“在这个日日喧嚣、处处泡沫、杂碎多元的媒体环境里,这类争论再难得到像八十年代那样普遍的关注和回响。”^{[5]247}不过,二十年后猛回头,当年讨论涉及的一系列精神价值命题,如今看来不仅不是高蹈玄虚的杞人忧天,而且成为人人忧心的社会现实——精神沦丧、信仰缺失、道德失序、底线失守。在这场交锋中,双方两位标志性人物——张炜、张承志与王朔、王蒙,被流行评论冠以“二张”与“二王”,香港《二十世纪》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城头变幻二王旗》。王朔堪比当代大众文化的先驱与代表。在他看来,过去视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不过是所谓“写字师傅”,文学创作也无非是“码字”,目的在于伺候“二老”——老百姓与老干部,从而将作家定位成商家对顾客的角色,而他笔下的“顽主”,也个个“玩的就是心跳”。顾彬就此说道“我们完全可以把王朔称为严肃文学的掘墓人。在他那里失去了对于奠基性前辈的尊敬,不管在政治还是文化领域。紧随其后的是‘恶心’的胜利进军。自此而后,‘下半身’主宰了中国文学舞台,市场就是其同谋。”^{[42]365-366}

八十年代学界的主角是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史学、文学等更是如日中天,当时报考大学中文系乃是所有学子的最高梦想。而九十年代走红的多为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更成为学界中坚,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仅看光华管理学院门前多少北京大学“文科状元”摩肩接踵的身影,对此风向流转就可略见一斑了。社会科学专家的观点不仅在社会上呼风唤雨,而且对实际部门,乃至高层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陈平原的分析不无道理:

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而忽略了作为总体思想的“主义”。

九十年代以后,好多学者抛弃大字眼,转而讨论具体问题,或者说,希望把“主义”的理解和坚持,落实到具体“问题”的讨论中。

以前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者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九十年代,一度被扼杀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新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这跟以前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包打天下,大不相同。

社会科学的兴起,使得人文学者那种理想主义的、文人气很浓的、比较空疏的表达,受到了压抑。所以说,八九十年代的变化,包含着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各领风骚。

对于当下的中国,八十年代学者更多地持批判立场,而九十年代则讲究介入与协调。这似乎与人文、社科各自的特性有关。人文学者注重精神性,坚守自家的信仰与立场,甚至不惜当一个“永远的反对派”;社会科学家不是这样,更愿意采取建设者的姿态,注重现实性与可操作性,主动与政府、企业合作,以获得大量研究经费,并实实在在地影响社会进程。说夸张点,八十年代中国学界的擅长“批判”,与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关注“建设”,其实是人文、社科的“此起彼伏”所决定的。^{[38]141-142}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即政治热,“六四”风波后自然骤然降温。然而,《河殇》等虽然受到批判,但其追求的政治价值又通过市场化的去政治化潮流,日渐融入九十年代以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主流意识,演为“国际接轨”以及新世纪“普世价值”等说辞。不过,与《河殇》全盘西化相对,九十年代“国学热”曾经盛行一时,如果说“河殇”热望走向西方,那么“国学”则热衷走向传统。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国际反华势力甚嚣尘上,“银河号”事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等接连发生,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更是构成抗衡西化的强劲社会政治思潮。诸如《中国可以说》《中国为什么说不》等图书的热销就是一例。2009年,强世功在反思香港政制的文章里,对自由化的自卑与保守化的自尊作了辩证分析:

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在近代以来的实际政治环境中却不得不沦为被支配的边缘地带,难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辩护,由此产生难以释怀的忧郁。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尊而产生孤立主义的民粹倾向,也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卑而产生普适主义的投降倾向,这两种倾向又往往以极左和极右的方式展现出来,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张力不断拷问着中国人的心灵,使得近代以来

的整个中国史不断经历着“成长中的阵痛”。^[46]

在日甚一日的去政治化潮流中,“宏大叙事”失去了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魅力,日渐让位于小桥流水的“私人叙事”或鸡零狗碎的“一地鸡毛”。《一地鸡毛》正是作家刘震云发表于九十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与冯小刚1995年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都曾火爆一时,如冯小刚所言,“《一地鸡毛》更接近我的生活体验和艺术追求,也更贴近观众”。从九十年代的一些顺口溜,也能体味类似精神动向: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这些层出不穷的民间段子,既透出耐人寻味的社会心理与心态,更流露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颠覆权威的精神取向。这一精神取向从王朔、葛优一路的反讽、调侃、玩世不恭、一点都不正经等,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戏说”、“恶搞”、“大话”以及网上的乌七八糟不堪入目。与此同时,更有一路去政治化的政治,依然延续八十年代新启蒙的价值追求,直接诉诸解构一切社会主义传统。2014年一部《电影政治》的新书,就将1993年三部影片视为“电影政治”的大转型:张艺谋《活着》、陈凯歌《霸王别姬》和田壮壮《蓝风筝》。^[47]显然,三部影片同严歌苓《陆犯焉识》等作品一样,成为更有影响的“伤痕文学”,在智识阶层与大众媒体的共同推动下形成文化政治的新标杆,恰如八十年代在中国风行一时的苏联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在诸如此类的文字及其流风下,一切革命以及社会主义传统日渐失去历史的合理性与道德的正当性,或成为悲剧,或成为闹剧。无怪乎,天性敏锐的昌耀在用一生铸就的诗坛青藏高原上,以一首《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1998)的长诗,发出屈子天问一般发聋振聩的精神长啸,也隐然透出新世纪再政治化的时代心声:

我在物欲横流的世间,“堕落”为一个“暧昧的”的社会主义分子……

看哪,滴着肮脏的血,“资本”重又意识到了作为“主义”的荣幸,而展开傲慢本性。它睥睨一切。它对人深怀敌意。它制造疯狂。它蛊惑人心。

这个世界充斥了太多神仙的说教,而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英特纳雄耐尔”的歌谣……^[48]

不难想象,在去政治化的趋势与潮流中,所谓“告别革命”不仅是李泽厚与刘再复为代表的精英意识——1995年香港出版了一部二人的谈话录题为《告别革命》,而且也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仅从这一波及广泛的思想闲谈中,也可以明确感受到去政治化并非不讲政治,不问政治,而只是淡化、祛除,甚至否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一整套政治传统与政治价值,并在偏离或背离这一价值之际,日渐确立另一套政治价值。如此去政治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印证了邓小平关于两种改革方向的远见。尽管邓小平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实践探索中避谈姓社姓资,但在根本原则与政治方向上却始终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他大力推进的市场经济绝非不讲政治的中性概念,而同样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语中的社会主义,绝非可有可无的穿靴戴帽与官样文章。他的南方讲话明确说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9]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确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目的都在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于将中国建设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纵观邓小平一生行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属矢志不渝的精神所托,价值所寄,而这也正是近代以来一批批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之为奋斗的理想与梦想。

毋庸讳言,这样一套政治价值与理想信念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潮流中不仅渐行渐远,而且往往名存实亡。也就是说,名义上或许还举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而其中蕴含的人间正道与人类正义的精神价值则日渐褪色,从政治原则的漫漶不清到思想阵地的改旗易帜,已是触目皆是的普遍现象。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将军在2014年“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的一番话,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酣畅淋漓,激情飞扬:

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到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

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成为目标本身。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发展、只要增长,可以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绥靖主义空气弥漫。

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

别人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些节目,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管意识形态的人不懂意识形态;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有意无意放弃。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省委书记的工作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掉正义,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

人最有价值的工作 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这件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我们今天一些领导同志追求所谓开明的国际形象,倡导个人独立的人格,特别在意西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50]

(二) 新自由主义对新左派

正当去政治化潮起潮涌之际,一场看似突如其来的“讲政治”浪潮却为九十年代画上了句号,正如震撼人心的政治风波为八十年代作结一样。这一政治化浪潮,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或论战。

作为财产私有、个人权利、资本法权等一整套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一直暗香浮动,不绝如缕。八十年代的“精神污染”、“自由化”、“文化热”等都是这一思潮的涌动。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外诸多变局,如苏东解体、美国独霸、新阶级隐隐出现等,自由主义夤缘际会,渐成气候,并汇入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当时,“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海外经济学家张五常等名重一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被奉为新自由主义“圣经”,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传播,张五常在中央党校以及京沪高校频频露面,发表演讲,声称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枚钉子云云。于是可想而知,1998年圣诞节,《南方周末》刊发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文章为何径直宣称:“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51]

何谓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一语中的“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其中,‘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纲领的标志。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5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一节曾经预言,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势必走向国际垄断。如果说国家垄断的主体是托拉斯,那么国际垄断的主体就成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胃口不可能局限于一地一国,而必然追求资本与利润在全世界的畅通无阻,新自由主义就是跨国公司及其国际垄断的思想理论通行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说得好:“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53]

相较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更加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故称“原教旨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

“市场万能论”。它在经济上否定各种公有制,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等;在政治上否定社会主义,也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从而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清除各种壁垒;在战略上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即所谓的“全球化”、“国际接轨”等。从世界范围看,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是其达到完成形态的里程碑,包括十项政策主张: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放松外资限制、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其间,美国后院拉丁美洲一度沦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区,美国培养的一批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力推的基本国策大都来自新自由主义。由此导致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统称为“拉美化”,如贫富差距、社会动荡、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在九十年代末付梓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记者何清涟就此写道:“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以高通胀、高失业率、高度腐败、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和累累外债为代价,虽然换得GNP的高速增长,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贫穷、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分配恶化、政局不稳等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苦难的深渊。”^[54]以已故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翼运动的兴起,也可以视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弹。总之,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的简要评论:

从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察析,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尽管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颗粒,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包括萨缪尔逊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都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应当说,这些称谓准确地描述了它的思想特征。^[55]

作为当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理论上的代表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实践中的先驱有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金融大鳄索罗斯、媒体大亨默多克等。这套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经济纲领不仅影响西方,包括大规模的媒体兼并、国营媒体的私有化、公共媒体的瓦解,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形成强烈冲击,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走向,如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也处于这一历史语境,免不了受其波及。一位清华出身的财政高官曾经公开声称:“我们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行事的。2008年,作家邱华栋在长篇小说《教授》中,塑造了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农家子弟,成名后与资本沆瀣一气,发表种种雷人高论,让人想到现实中呼风唤雨的‘名流’、‘精英’,就连他的嫖娼行为也多有真实原型。作品列举的如下观点,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堪称当代中国的‘拍案惊奇’:

经济学家是研究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变化的,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中国改革利益受损失最大的是领导层,是社会管理者。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中国的贫富差距我看还不够大,只有拉大了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穷人应该把富人看成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不对?

我看应该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的话,中国的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我知道中央政府、国务院希望给穷人多想办法,多考虑民生,于是又是取消农业税,又是要压低房价,同时,增加奖学金和贷学金,研究新的医疗保障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我看实现起来很难。现在,我说实话,还不是大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和税收,没有好到那个程度。蛋糕根本就没有做到足够大,现在,你实际上是在杀富济贫。

如果说《教授》还只是小说家言的话,那么《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刊发的深度报道《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则披露了十位当红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的真切关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文中涉及的经济学家有钟朋荣、董辅初、吴敬琏、萧灼基、张维迎、盛洪等。报道最后引述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的话,可谓画龙点睛:“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主张正义、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靠谁养!反过来讲,就算被养着又怎么样呢?”^[56]于是,记者感叹:“早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而今,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并形成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阶层与财富越来越密切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他们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兼容和谐。”^[57]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举的一个例子,如今已是司空见惯:

2004年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国企改革问题。其间上海一位地位很高的老经济学家发言,讲了一个故事。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为上海一个私人大企业争取到一项有利的立法,这家企业后来为了“表示感谢”(他的原话),让他当独立董事。这位老兄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天知道他的廉耻之心到哪里去了!商品交换和政治是有明确界线的,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把商品交换的规则搬到政治上来,还以为是正常的事情。^{[13]154}

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内外许多严肃学者都进行了强烈批判,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

格利茨。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更直言不讳地批评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问题:“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不仅是青年大学生,更值得警惕和注意的主要是经济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恶浪就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明证。”^[58]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提到的“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也可谓对国企改革历史中新自由主义惨痛教训的警醒。与哈贝马斯一同获得2013年度意大利“帕西奥利奖”的清华大学教授、原《读书》杂志主编汪晖,九十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新自由主义的文字,深刻犀利,影响深远:

“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为名,但其核心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市场激进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新自由主义”不仅以专断的方式排斥各种批判理论,而且对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其他传统如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平等主义取向、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有关讨论也毫不宽容。

新自由主义用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在以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下,放弃对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巨大的贫富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的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等现实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掩盖了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

从1998年起,《读书》杂志、《天涯》杂志和其他一些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有关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探讨,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尤其是金融危机)等方面极为有力地回击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在这一讨论中,卡尔·波拉尼、布罗代尔的理论 and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或经济史的批判视野中,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重新检讨历史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与当代经济危机的联系,分析新自由主义有关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自然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这些理论预设被展示为一种历史的虚构和意识形态。^[59]

2014年,郑永年在《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一文中,具体详实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作为。文章说,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中国正式告别计划经济,“在走上资本主导经济道路的同时开启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过程”,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旋律。其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主要影响在于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实即中国特色的“私有化”)和福利的市场化。若说前者还有一定必然性、必要性的话,那么后者则导致诸多始料未及的后

果。郑永年写道:

在企业和资本获得自由的同时,社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传统上计划经济负责的领域如医疗、教育、住房等逐渐市场化和货币化。19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同时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医疗保险。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住房的产业化也愈演愈烈,房地产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至此,中国所有主要的社会领域都被货币化和市场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这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程度也远较中国为低。只有拉丁美洲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右派政治强权(例如军人政权)的扶持下进入社会领域。^[60]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后果远不仅限于此,除了大规模下岗失业问题和世纪末几近崩溃边缘的三农问题,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同样广受关注。比如,由于政府监管不力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水污染问题、豆腐渣工程等。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从改革开放初的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成为一个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处于社会顶端的1%富人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而最底层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财产总量的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用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上升到2003年的0.4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郑永年最后指出,“客观地说,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医疗和义务教育改革,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恶果。看病难、看病贵、房价居高不下等等问题始终存在”。^[61]

在批判与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所谓新左派或新左翼。何谓“新左派”?新左派自然是针对老左派而言的。如果说老左派是指那些固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势力,以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同资本主义社会势不两立等为标志,那么新左派则包括形形色色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势力,如学界包括传播学界影响深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两大分支之一的批判学派,也可归入新左派或新左翼的思想谱系。不过,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新左派更像一种污名化修辞,通过“左”的标签而将对手置于尴尬地位。按照甘阳的说法,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交锋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因为相对于新左派的应是新右派而非新自由主义^[61]。在他看来,新左派也好,新自由主义或新右派也罢,均属自由主义,只不过一个是自由左派,一个是自由右派。自由左派继承罗斯福的“新政”传统,并

与“第三条道路”相呼应;自由右派则秉持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与国际资本相契合。具体说,自由左派更注重民主,自由右派更强调自由,所谓“穷人爱民主,富人爱自由”;自由左派强调社会公平,自由右派更突出经济效率,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由左派更倾心独立自主,自由右派更痴迷“国际接轨”。总之,自由右派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故需进一步解开束缚市场的各种管制,同时建立一套西式政制如宪政民主以及相应意识形态。而自由左派认为,当代一切问题的根源均在于全球资本的扩张,以及野蛮的资本逻辑对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社会的支配,从而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因此必须摆脱这种弱肉强食的政治逻辑,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社会事业,包括人民民主。用郑永年的概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派代表了新兴富裕阶级的利益,而新左派则代表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但事实上,新自由派和新左派都不愿把自己与任何社会力量完全结合。”^[62]在《两个周期内的中国——90年代初以来经济社会与思想简评》中,祝东力也对新左派作了如下总结:

新左派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理论流派,它产生于90年代中后期,是对当时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一种理论化的反应。一般地说,它侧重批判资本和市场,相对淡化对国家和权力的反省。这其实微妙地表达了一种立场。所以,它更多关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共同的问题,这种特点决定了它较多地借用西方左翼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影响了其文风。所以,行文风格和西学色彩其实都只是表象,基本立场才是实质和根本。^[9]

(三) 新闻、商品性与专业主义

当代新闻变革在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即新闻观念、新闻业务、新闻体制。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变革集中于新闻观念和新闻业务,那么九十年代以来新闻体制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组建报业集团、广播影视集团、出版集团等,到新世纪文化体制改革方案等无不如此。而九十年代的新闻体制变革以及一系列相应状况,归根结底无不源于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市场力量的迅速崛起,带来了中国社会空前活力,市场主义也很快成为朝野各方共同接受的共识。在改革的黄金时代,市场参与各方都成为经济增量的受益者,市场也因此成为自由、平等、效率和公平的代名词。”^[63]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1999年接受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樊凡访谈时,将新时期以来的新闻变革归纳为十点,既勾勒了新闻演化的专业内容,也显示了市场经济的潜在背景与力量:

其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凸显新闻的信息功能,满足人的信息需要;其二,从回避现实矛盾到面对现实矛盾,推进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的实现,复活人的主体意识;其三,从灌输式到讨论式,从舆论一律到舆论不一律,尊重受众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体现新闻传播过程中人与人的互动;其四,从终极式报道到动态式、进行式

报道,使人参与到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其五,从单侧面报道到多侧面报道,重建新闻的客观理性精神;其六,从单纯强调新闻的指导性到注重新闻的服务性,强化了新闻为人而存在的价值;其七,从单向新闻传播到受众参与性的增强,使新闻传播更能再现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更能满足参与传播的人们对文化意义的分享;其八,新闻媒体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的转变,又在多功能的建构中分化出多种新媒体,全面覆盖人的生活领域;其九,从多媒体竞争到多种媒体的优势互补,形成了多样性统一的媒介文化世界;其十,从非市场化转向媒介市场的建构,强化媒介经营管理意识。^[64]

从九十年代以降的具体情形看,新闻传播主要受制于三方面的强力影响:一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动因,都市报以及财经媒体的盛行就是突出一例;二是以网络、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为核心的传播技术革命;三是以所谓全球化为标志的国际大环境,其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潜在影响更是首屈一指。九十年代初,一场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拉开了新一轮新闻变革的序幕。讨论焦点集中于新闻是否有商品性,或说有,或说无(新闻不是商品,记者不是商人)。2013年,在《从三次新闻商品性的讨论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一文中,陈力丹将双方理据概括如下:

批判新闻商品性的说法主要有:价值规律断然不能支配属于上层建筑的新闻事业,绝不能用市场经济规律替代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认为鼓吹新闻的商品性是新闻改革主旋律中的不协调音符,为有偿新闻寻找理论依据,而有偿新闻是新闻商品化的集中表现。新闻作为精神产品,其价值难以量化。报纸的价格,并非是新闻的价格,就商品的交换价值来说,新闻是不能买卖的。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并非是物质形态,因而就不可能具备商品的属性。新闻具有社会责任,所以它不能是商品。新闻媒介的运作机制是导向机制,不能是商品机制。

肯定新闻是商品的说法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纸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报业作为一种产业,又属于经济范畴,新闻产品是商品,新闻事业也是有偿的,新闻机构与新闻受众之间的关系从价值法则来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新闻事业必须产业化,在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增加其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大力开辟产品销售市场。有的文章还谈道,节目作为电视机的软件,是和它的硬件一起被消费者看成商品的,就像新闻之于报纸一样。精神产品和它的载体一起,被商品经营者卖给了消费者。^[65]

针对新闻商品性的论争,1995年李良荣教授提出一种调和观点——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属性,故需坚持党性原则;一方面具有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包括商品性,故需开拓市场,服务公众。^[66]这一观点得到普

遍认可,为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之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下,新闻业开始向市场化方向突飞猛进。其间,按照李良荣的分析,报业形成周末版、晚报、都市报的三次热潮,广播电视形成“新闻立台”与“娱乐立台”的齐头并进。^[67]

相对于八十年代“党性与人民性”等高度政治化议题,新闻商品性讨论针对一个看似非政治化的话题展开,既契合着将市场作为中性工具的思路,也体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向。而后来的历史事实日益显现,新闻业一旦走向市场,追求市场化、商品化、资本化,就势必产生一系列相应的政治后果,就难免导向去政治化,“党性与人民性”的政治价值与传播伦理就随之发生变异,并不断遭遇或明或暗的挑战。对于新闻的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等问题,严肃地讨论一向关注的是种种新闻乱象,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变相广告、新闻民工、新闻的娱乐化庸俗化等,而其中致命症结恐怕还在于赵月枝教授尖锐指出的政治化问题:

西方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如果中国还希望建立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希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说,共产党在媒体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上,就不得不认清和面对这一现实——如果让媒体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建立。……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就是痴人说梦。^[68]

如果说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为媒体的商业化、市场化、资本化打开了思想通道,那么随后都市报的异军突起,则提供了新闻与市场联姻的现实渠道。以1995年《华西都市报》创刊为标志,都市报在九十年代中期登上报业舞台,并以旺盛的市场生命力成为媒体变革的弄潮儿。经过十年发展,截至2004年,全国已有大约七百多家都市报。由于都市报的迅猛发展,九十年代的媒介生态发生明显变化。首先,新闻业在经济上逐渐自立,开始摆脱单纯依赖财政拨款的窘境,一些媒体甚至成为财大气粗的“暴发户”,由此媒体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在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外有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盘算。同时值得深思的是,“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成为一套流行的学术话语或政治话语,预示了媒体应当并可以自行其是的思想逻辑。其次,报道方式和风格日趋都市化与市民化,从正大光明的宣教开始转向家长里短的叙谈。九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赢得青睐,后来“民生新闻”更将这种趋势推向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失去政治方向与价值追求的去政治化媒体,在逐利的市场化新闻实践中日益陷入琐屑庸常。最后一点,由于大众媒介在当代文化生活和社会领域的突出功能,媒体的都市化和市民化趋势无疑也推动了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汹涌泛滥。

面对市场大潮和以都市报为先锋的“市场化媒体”冲击,主流媒体不得不起而应对。九十年代初,扩版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纸相继扩版或出版周末增刊,扩版之风迅速蔓延整个报界,几乎所有报纸都从4版变为8版、12版、16版……当时至少有150家报纸分别以周末版、星期天、月末刊方式加入扩版行列,中国报纸由此进入所谓“厚报时代”:《深圳商报》日出版40版,《广州日报》几经调整,将周末版扩至40版,《南方都市报》达到128版,《计算机世界》更创下200余版的纪录。扩版之风既来自市场经济对各种信息的渴求,也源于市场条件下新闻媒体对广告的依赖。发展至今,媒体早已不靠销售维持,而主要由广告支撑,其收入的大头来自广告。这一变革影响深远,2007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尹连根等指出:

在中国的报界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叫“有效发行”。有效发行其实就是能给报纸带来广告投放的发行,本质上就是有钱发行。那么在广东,什么地方最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放广告?当然是珠三角地区。所以,广州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首先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发行量,然后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版面。在广州,由于地产广告在报纸广告中所占份额很高,所以广州报界向来极少刊登有关地产商的负面新闻。^[69]

随着新闻竞争的白热化,为了所谓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九十年代中期报纸杂志一度充斥“四色报道”:“红色的秘密(披露领导人的秘闻趣事而真假莫辨),金色的诱惑(对大款、大腕的挥金如土津津乐道),黄色的刺激(淫秽内容的大肆渲染),黑色的恐怖(暴力凶杀的详尽描绘)。”^[70]在这种情况下,虚假新闻开始泛滥、职业道德不断下滑等,都是人们经常诟病的问题。为了市场效应,获取更多广告收益,一些媒体甚至不惜牺牲新闻的生命——真实,饮鸩止渴地竞相抛出耸人听闻而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2001年7月22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美国医生操刀换人头》,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后经调查,原来是一篇错误百出的虚假报道,是记者根据怀特医生1999年在《科学美国人》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改写而成的。由于翻译原因,报道多处曲解作者原意,把原文的科学设想当作现实存在。针对此类新闻乱象,熊蕾批评道: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小报低级趣味泛滥,知识性变成了性知识,趣味性变成了性趣味,指导性变成了性指导,读者称有些法制报纸为教唆犯,刊登一些作案的手段和细节,甚至有性挑逗的描写。

即使不是娱乐性传媒,新闻的娱乐化趋势在90年代以后也有愈演愈烈之势。“时尚”、“消费”、“娱乐”等先后成为报刊的卖点和竞争的主题。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在整个报纸中所占分量却不断下降。人们阅读报纸不再仅仅是为了获知新信息、新

知识,或接受政治教育,而逐渐是为了消遣、实用。

在新闻娱乐化的影响下,以政治、思想、国内外形势等为报道内容的“硬”新闻的数量逐渐减少,而介绍人物、报道受众感兴趣的事件以及对受众有用的事件的“软”新闻,特别是对一些丑闻、离奇古怪的事件的报道大幅增加;对所谓“热点”猛炒爆炒;对明星、名人穷追不舍;以耸人听闻来博一时的轰动效应。有些电视媒体甚至发展到对矿难、绑架人质等灾难性新闻报道时,也做出会死多少人或人质要多少天获救的“有奖竞猜”,受到了公众的谴责。^[71]

面临虚假新闻汹涌泛滥的局面,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2年组织评选了一次年度“十大假新闻”。本想做了一次了事,有道是“人有脸,树有皮”,不料虚假报道未见收敛,依然如故,而且愈来愈烈。结果,当初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奖项”居然一年一评,延续至今,已经评选了十二轮。其中“获奖”作品大多出自市场化媒体与网络媒体,由此可见虚假报道层出不穷,络绎不绝,纷至沓来,防不胜防。评选2008年度十大假新闻后,主办者不由悲叹:

抗战八年,虽然漫长,终获胜利。然而,本刊评选年度假新闻,也已经整整八年,却尚未见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原以为只要竖起新闻打假的大旗,呼啦啦立马就会聚集起浩浩荡荡的讨伐大军,不消半个时辰,假新闻便“谈笑间檣灰飞烟灭”。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滋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72]

在市场大潮下,不仅市场化媒体的假冒伪劣新闻前赴后继,一些主流媒体也同样陷入结构性困境,包括市场与导向二律背反以及频频传出的“封口费”、“金元宝”事件等。在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与生存压力下,一些新闻人越来越像唯利是图的商人而非铁肩担道义的记者,也开始想方设法追逐个人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前述诗人与商人的分野,在这里也得到相应体现,就像揭露美国商业媒体弊端的影片《惊曝内幕》(The Insider)的台词所言:你是新闻人,还是商人!以至于九十年代坊间流传着类似的顺口溜: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拿红包,四流记者写外稿,五流记者写报道……如下这般“新闻商人”早已司空见惯:

1,收“红包”,即目前在报界已经“合法化”的所谓“车马费”。这种“红包”一般都是某公司或单位开一个面向所有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然后给所有与会记者一份通稿和一个红包。这种红包价值不等,高的5百到1千元,低的也许仅50元。腿脚勤快的记者若经常跑这种发布会,也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2,有偿新闻,这在中国报界又有一俗称,

即“软稿子”。言外之意是“拿了人家的钱手软”。由于目前中国报业广告市场竞争激烈,报纸广告普遍存在把关不严,有钱辄登的倾向,因此虚假广告不少,久而久之,广告效果并非很好。相对而言,新闻则有着中立、可信等品质,传播效果优于纯粹的广告。何况,通过媒体的正式渠道刊登广告所支付的广告费用要远高于通过私人渠道刊登新闻所需要打点的费用。所以,无论从效果还是从费用的角度来说,有偿新闻都比广告更受广告客户青睐。现实中,有偿新闻也是编辑记者一个重要的工资外收入来源。³佣金。中国的人情社会和非制度化生存的本质,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和境遇的顺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手中社会资源的多寡,而不是遵纪守法程度的高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些依靠工作关系而建立起大量人脉的编辑记者便有了可用武之地,即通过牵线搭桥、从中斡旋、为当事人或趋利或避害,从中获取佣金,这类费用又称“打点费”、“好处费”等。⁴拉广告。在采编与广告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报社,部分编辑记者之所以热衷于拉广告,原因有三:首先,编辑记者没有广告业务员的广告任务压力,没有完不成任务的风险成本;其次,编辑记者能拥有相对较高的,一定比例的广告提成;其三,得益于手中的新闻平台,记者比广告业务员更容易使广告商买账。访谈中,笔者被告知,有些记者一年光广告提成就可以拿到30万元。⁵编辑记者个人开公司。^[69]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课题组对55家媒体的1000多名新闻人作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将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记者拉广告的行为表示赞同或态度暧昧;超过五分之四的受访者对自己的栏目拉赞助表示同意或态度暧昧;六分之五以上的受访者对接受采访对象的招待表示同意或态度暧昧;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对接受采访对象的现金馈赠表示同意或态度暧昧。^[73]据此,陈力丹教授认为“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对于基本职业规范的遵循状况,仍然十分低下。”^[74]

面对市场风云变幻,因应新闻诸多变局,特别是媒体公信力危机,舶来的新闻专业主义或专业主义,顺理成章取代了已被八十年代新启蒙窒息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成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主导性专业理念,日益广泛地左右着新闻实践、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或专业主义,原是美国社会政治与商业媒体环境的产物,理论上是指一个市场主导的社会中,新闻媒体既不依附于权力,又不受制于市场,力求保持独立、客观和公正——公信力。为此,还形成一套相应的操作手法,如只提供信息、不发表观点;既提供这一方观点,也提供另一方意见等。应该说,新闻专业主义流入中国确实在专业操作层面,为化解市场化弊端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参考,用陆晔与潘忠党在《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

建构》一文的分析:

只有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非常牢固地以专业主义话语得到整合,才能抗拒市场对严肃新闻话语的侵蚀;只有将建立在专业主义基础上的对媒体、对新闻工作者的期待变为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才能抵御纯粹市场导向的新闻话语的蔓延。^[75]

但同时又不能不清醒看到,新闻专业主义即使有一定合理性或科学性,对维护媒体公信力与报道真实性在操作层面更有直接裨益,但其专业核心理念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价值,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存在一系列深刻而内在的差异、冲突或对立,尤其对党性、人民性的基础构成不可避免的消解之势。就此而言,九十年代以来新闻专业主义在业界与学界的盛行及其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也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去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政治。如今,“无冕之王”、“第四等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社会公器”等概念与意识,俨然成为新闻传播、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似乎不言而喻的思想前提与话语逻辑,仿佛离开这套说辞,我们就不会言说自己的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了。以专业主义核心理念“新闻自由”为例,九十年代末的一场学界论争如今反思,既应和着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潮流与社会背景,又为新世纪的新闻格局奠定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思想根基。讨论双方实际上都没有提供多少实质性的思想进展,借用的理论资源及其范式既像旧曲新翻,争鸣的专业话题及其取向又像新启蒙与老左翼的斗气交锋。一方发挥的无非是正统无产阶级新闻学传统,即八九十年代执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何梓华教授在《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出版自由》一文中阐发的思想^[76],借用赵月枝在2014年一篇文章中的概述: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一套新闻自由理论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闻自由观。这个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过程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包括了在宪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中,“无产阶级新闻自由”首先被定义为,新闻机构摆脱国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自由。^[68]

而另一方则秉持新启蒙的价值言说,隐含着“一种制度(国际接轨),一种自由(普世价值)”的思路。虽然这场专业讨论与同一时间波及广泛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辩并无直接关系,但时代背景和精神氛围又一脉相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辩,还是新闻自由之争,无不身处同一社会历史状况:数千万城市工人下岗以及主人翁地位与尊严的沦丧、数亿农民面临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的现实“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此而言,倒是批判学者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更为深邃的

思想启发:

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话语霸权。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了中国“新闻自由”言说的理论和世界历史及现实的参照。

任何一部宪法都明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新闻界的自由,更不等于私人所拥有的已经成为跨国财团的媒体机构的自由。当下流行的“新闻自由”言说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相关但并不一致的自由主体: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作为特定社会组织机构的新闻媒体的自由?

虽然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在一个社会成员对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公民——即宪法序言和总纲里的“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媒体不但为党和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财政支持,不从事任何商业牟利活动。但过去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媒体自身变成了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今年(2014年)初,著名媒体改革家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一篇文章中就建议,新闻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既然大型网络提供商和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本身就不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特定国家政策的产物,它们就应该像美国的公路系统那样,成为公有或非营利的机构。这种激进的新闻改革言论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时至今日,国内新自由主义学者过滤进来的西方“新闻自由”理论,还是美国冷战时期最具反共色彩的新闻自由理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自由”诉求,可能会劫持人民的表达权利。一方面,它可能被业已商业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媒体机构所劫持,从而使“新闻自由”变成媒体机构的自由;而媒体机构则以公民自由之名,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进而谋取一己之私。另一方面,在国际语境下,“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宣称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的话语所劫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想通过对思想和舆论领域的干预来重建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失去任何意识形态和道德制高点。^[68]

这场新闻自由的争论最后由于外力介入戛然而止,但这个问题并未因“不争论”而销声匿迹,相反始终伴随当代中国及其新闻传播的进程,而且愈发广泛地深入新闻业与新闻学,结果是新自由主义及其新闻观的盛行而非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的确立。在青年学者王维佳看来,这一去政治化政

治的进程八十年代以来始终遵循着他所称的一套“统一的政治逻辑”:从文法到商品,进而到产业的理论变革和实践变革,实际上都是这个逻辑在起作用^[77]。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赵月枝针对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以及圣火传递上的歪曲报道,在《新闻大学》撰文《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同样谈及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及其政治逻辑:“我们崇拜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向往它所体现的自由主义境界,甚至暗暗希望它成为‘普世’法律。当然,我们更景仰美国国父们的伟大、英明和民主精神。但是,我们好像缺少对新闻自由,尤其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负面自由的法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认识。”^[78]

三 新世纪:再政治化

(一) 大转型,全球化

如果说“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与“全球一体论”(全球化)相继成为九十年代以来盛行的三种世界性话语,并填补了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那么世纪之交,风头最健,乃至一枝独秀的无疑当属全球化了。全球化是仁慈的福音,还是阴谋的陷阱?是发展的过程,还是既成的事实?是自然趋势,还是人为操纵?是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还是旃裘之君长南下而牧马?有关论述纷纷攘攘,莫衷一是,而无论如何,21世纪的中国已与世界形同一体,世界的问题往往就是中国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同样也是世界的问题。

上节谈到九十年代以降,新闻传播具体受制于三方面影响:市场经济、新媒体与全球化,其中新媒体与全球化新世纪以来更是备受瞩目。实际上,新媒体同属全球化的有机构成,“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联网”^[79]。关于新媒体与全球化的滔滔之论,用汗牛充栋早已远远不足以概括,与此同时,从历史视野与哲学视角有机融合的层面透视这一现象及其趋势者则又寥寥无多,赵汀阳的《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当属一例。在他看来,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坚持用现代性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既然现代游戏正在终结而全球游戏正在全面展开,那么就需要反思现代什么事情正在被严重挑战。为此,他提出运算单位的概念,相信运算单位才是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而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是个人,一是民族国家。所有现代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知识建构,都是按照这两个运算单位来确定的。比如,有了个人,就有了自由、个人权利等价值,市场、竞争、法治无不依附个人运算单位。民族国家也一样,现代国际政治均以民族国家的运算单位作为依据,从而解释了主权、国际法、霸权、权力均势等。而正在进入的全球游戏则与之不同,其间决定性运算单位已经成为“网状存在”,互联网就是典型。从存在论上说,全球时代的决定性存在单位是关系而非实体,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关系存在,关系存在决定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一句话,共在决定存在。

于是,在新的全球游戏中,最大生存机会不再是一个实体对自身进行全方位的防卫,而是充分利用网络式的关系存在路径去发展,争取成为网络关系中纲举目张的关键点,从而支配整个网络关系。网络关系当然并不限于互联网,而指全球游戏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存在。如果仍以现代的运算单位看问题,美国和中国看上去就是最大受益者。假如换作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那么最大受益的存在单位不是任何国家,而是另外一些虽然仍然属于某些国家但同时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这些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中,目前最大受益者是金融体系和媒体体系,后者包括网络、手机以及将要出现的新媒体。换言之,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才是目前全球游戏中的最大赢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即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之王”,甚至比大国更有影响力和支配力。赵汀阳认为,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目前虽然还受制于某些国家,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上看,这些网络状的权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流动,慢慢控制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的一切可能性。因此,金融和媒体成为新的专制形式,即实际上最大的权力,这种专制其实早就开始了,只是越来越明显。随着全球游戏的发展,还会出现多种同样具有网络式关系特征的权力,凡是能像网络般生长的权力都会是全球游戏的权力集团成员。全球游戏新专制的特点是,它依赖的不是政府、军队和警察,而是通过提供普遍全面的“最好服务”,使所有人为了得到必要的服务而自愿被支配。故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就是权力。以后,前卫的观念未必来自思想家,而可能来自新游戏的创作者,如支付宝、谷歌、QQ、微博、微信等。赵汀阳最后归结道:

据说生物技术和电子技术还将有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不久的将来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彻底全方位的服务,可以想象,人们将在得到一切所需的方便的同时也被全面支配和控制,舒舒服服地被控制。资本绝不会错过与新技术合作而成为普遍权力的机会。未来的权力将具有越来越明显地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也许可以称为“超越权力”(Transcendental powers)。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批判新权力,而是在反思新游戏的存在状况。任何游戏都存在权力结构,新游戏必定有新权力,取消权力结构的权力游戏是难以想象的。问题在于,世界很可能会与新权力同流合污,我们只能指望世界与新权力同流而不合污。因此必须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于疯狂,来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意义。^[79]

了解新技术与世界媒体发展史都知道,从19世纪中叶电报的发明以及全球性电报网络的迅速搭建,到19世纪末电话的普及与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从20世纪初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成熟以及奠基其上的无线电广播突飞猛进,到二战前后发明成功并在20世纪中叶全面影响全球人类的电视,进而到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无孔不入,现代世界权力关系

的每一步拓展与深化无不依托于受制于网络化的传播新技术,西方世界的霸权体系一刻也离不开四大全球通讯社、美国三大广播公司、BBC、CNN、《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等。中国自九十年代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开始介入全球化潮流与全球化体系——主流的表述始终是“经济全球化”。同时,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自然同这一全球性网状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同样离不开赵汀阳所说的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对此,祝东力在《两个周期内的中国——1990年代初以来经济社会与思想简评》一文中概括的六点变化,深刻触及世纪之交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大转型:

首先,伴随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造,工人群体的身份完成了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公有制体系内,工人享有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社会经济权利,因此成为政权主要的依靠对象。在“文革”和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中,工人群体都是一支稳定性的力量。但是,经过急剧的国企改革和下岗潮,到90年代末,体制内的传统工人阶级已转型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雇佣劳动者。

第二,由于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加剧,包括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市第二、三产业的通道被阻塞;同时,乡镇企业陷于困境,继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制大多改为私营企业,农村贫富分化;另外,1996年粮食生产过剩,一方面生产成本连续增长,另一方面粮价低落,谷贱伤农。世纪之交,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三农”问题爆发,成为公共议题。1999年12月,温铁军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影响颇巨,此后“三农”研究成为社科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显学。

第三,短短几年内,经济社会关系逆转,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它对城乡社会秩序、心理秩序的冲击造成了严重的失序失范,更是建国以来没有先例的。被甩出改革和发展进程的大量弱势群体本能地寻求各种精神安慰,寻找各种信仰,特别是那些为这个时代的民众心理量身打造的所谓“邪教”。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信众包围中南海,下层社会以畸形的信仰对抗日益空心化的国家,这是精神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第四,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质是全面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承担中低端制造业的产品生产,从而与美国的金融、高科技,欧洲的高端制造业,中东、拉美、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输出,共同构成全球产业体系。

第五,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根本调整,使“两阶级一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传统社会宣告解体。作为这种变局的反映,2002年初陆学艺

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问世,反响剧烈。

第六 经济社会关系的丕变在执政党的纲领和核心文件中得到了及时概括和反映。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在世纪之交重新表述了党的宗旨。……这意味着执政党完成了深刻的转型。

总之,随着国企改革完成和中国加入WTO,世纪之交,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同时抵达划时代的转折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执政党转型同步进行,它们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9]

依他之见,这一大转型对思想文化产生强烈震动,理论界出现了新左派,创作上产生了底层文学。文学出身的祝东力,对底层文学自然更多敏感的体认,他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也触及当代文学(文艺)的普遍状况与致命症候:

底层文学出现在新世纪初,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2004年)是较早的一篇。底层文学主要以同情的笔调去审视、刻画上述十大阶层中的最后三个阶层——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或者说,以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为描写对象。但是,由于1985年以后文学“向内转”,纯文学观念占支配地位,对于表现社会现实,当代作家们普遍缺乏思想和艺术的积累。这极大地限制了底层文学的成就,结果,其作品的影响基本上仅限于文学界,难以进入公共话题。例如,底层文学中的农村题材作品,与同期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2000年)或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等社会学著作相比,就影响力而言,没有一部能望其项背。考虑到中国文学,包括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伟大传统,底层文学的这种状况的确是文学界失职的表现,准确地说,文学其实已经失去了承担社会公共话题的能力。^[9]

中国社会的这一大转型,乃同世界的大转型息息相通密不可分。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市场与社会形成一系列波及全球的角力与较量。波兰尼论及这一问题的经典之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在新世纪引发全球性关注绝非偶然现象。正如弗雷德·布洛克2001年为新版《大转型》写的导言所述“许多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已经从波兰尼的论述中得到了理论启发。”^[80]¹⁴《大转型》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问世于同一年即1944年。作为新自由主义之父,哈耶克不遗余力地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与之相对,波兰尼的“《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即相信不管是民族国家社会还是全球经济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最强有力的批判”^[80]¹⁴。如果说哈耶克是九十年代中国精英的膜拜偶像,“哈耶克的书随处可见,中国可能是哈耶克最大的思想市

场”^[81]⁷;那么,随着新世纪新自由主义江河日下以及全球乱象,波兰尼的思想则越来越得到有识之士的心仪,“对于理解21世纪之初的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81]⁷。斯蒂格利茨为2001年《大转型》修订版撰写的《前言》中说道“波兰尼常让人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与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动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82]¹波兰尼以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雄辩论证有力证明,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神话或乌托邦。他在《大转型》开篇处,就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不消除社会的人性和自然本质的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这种制度根本就无法存在。它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这一核心思想,同哈佛大学教授、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倒不谋而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鼓吹的那种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今天的世界上也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人类的灾难。”^[81]¹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的人类社会的现实,特别是后冷战时代的乱象也充分证明,“一个所谓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斯蒂格利茨)^[82]⁷⁸。

理解《大转型》的关键是“嵌入”。在《波兰尼的〈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一书中,王绍光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如果人类的经济关系“嵌入”社会关系,那么,如此构成的现实状况可以称为“社会市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前,经济关系都是嵌入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之中的;而市场仅仅是社会的附属特征,绝不是最重要的,是工具而不是目的^[81]²⁵。反之,如果社会关系嵌入经济关系,那么就形成了“市场社会”:经济关系不仅脱离社会,而且社会关系都受制于经济关系,即人的关系都变成商品,可以买卖交换^[81]¹⁴。简言之,一旦所有东西都商品化,就形成市场社会。《大转型》核心思想就是用社会市场抑制市场社会,用市场“嵌入”社会的运动抵制市场“吞噬”社会的运动。这一双向运动不仅构成近代历史的“大转型”,而且也成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肆虐,“社会”吸收“市场”的反向运动更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世界性潮流。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比如中国推行的一系列“新政”:1999年,启动西部大开发计划;2002年,启动城市低保;2003年,支持三农,税费改革,筹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2004年,降低农业税,推进农村“三项补贴”;2005年,部分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免除西北地区农村学杂费,推行城市廉租房;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新农合,廉租房,农村低保,城市全民医保;2008年,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全民实现新农合,全面推进廉租房、城市全民医保、农村低保……^[81]¹⁰⁵至于从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到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更是“社会”吸纳“市场”的“大转型”。据此,王绍光总结道:

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

中国的情况似乎印证了卡尔·波兰尼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观察: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81]109-110}

同样,依照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欧树军的分析,波兰尼“所谓世界的大转型就是市场力量的扩张和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拉锯战”,只可惜19世纪“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并没有取得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而今日世界的大转型,只不过是又重新回到了两百年前,回到了一百年前”^[83]。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改革也走到一个历史节点。2012年,中共十八大宣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路线图“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实现这一总目标及其路线图,虽然面临种种现实的抉择与利害的冲突,但有一点看来不断明确,也赢得日益广泛的共识,那就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市场吞噬社会的历史应该终结了。《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的“封面选题: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就对此作了专题探讨: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种新的、自觉的、主动的时代精神迅速登场,自由放任的时代落幕了。

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和胆量预言这个新时代。我们只是看到,随着一个个贪腐官员的落马,过去的潜规则一一失效;随着一项项规定的出台,过去的默许退让一一被废止;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也不再回避自己的主张,而是表现出强烈的好恶爱憎。……令所有人吃惊的是,这个政党有着如此坚韧的生命力,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迸发出自我革命式的调整能力。^[84]

(二)文化政治的对冲

从世纪之交的新左派与新右派(新自由主义)之争开始,再政治化趋势就日益明显。所谓再政治化,不仅是指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无法继续就事论事地进行技术性应对,而必须重拾总体性的政治化思路,即使具体而微的现实问题、矛盾纠葛、利益冲突,也不能

不置于公平正义的人间正道层面审视。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再政治化意味着重新审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社会主义传统及其政治价值。换句话说,应对“问题”,离不开“主义”。不管白猫黑猫、不看道路方向、不问人心向背,一句话不谈政治原则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与正义性,而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经济增长,追逐个人利益,已经导致层出不穷而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也使任何解读思路与解决方案都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味与政治价值。金一南谈及的一件事情意味深长:

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紧急到前方处理去了。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7年内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有成绩。当石书记找他谈话追究责任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人给烧了?^[50]

事实上,此类事件包括数千万城市下岗工人及其家庭困境、数亿农民包括边疆少数民族的边缘化,且不说与此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已经严重危及“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如此众多的民众从国家主人翁沦为所谓“弱势群体”,怎不唤起国祚时运何去何从的严肃思考,怎不引起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与激辩。人民大众与知识精英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鲜明分歧,可以说也折射着这一再政治化的态势。留英中国学者林春在新中国六十周年时,撰写了一篇思想丰富、内涵厚重的长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开宗明义就提出关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再政治化问题:

当前的辩论,无论用哪一种理论体系的语言,集中于对于全面“接轨”必要和必然性的宣称与从根本上反接受一个剥削压迫、危机重重且继续破坏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全球秩序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其中指称、概念、意义、解释和想象等冲突背后,是中国的前途命运之争。这场斗争无疑牵涉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从而高度政治化,凸显路线和意识形态对民族发展的决定性指导作用。^[85]

林春这里提及两种“路线与意识形态”,说白了无非是三十年来貌似渐行渐远而实则一刻不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或宽泛意义的姓社姓资问题。事实表明,再政治化过程正是按照这样两条对冲的政治路线展开的,日益广泛、日趋尖锐的思想交锋不断使扰扰攘攘的“多元化”聚焦于二元对立。

下面先分别看看两线发生的一系列典型的文化政治事件,由此显现新世纪以来日益激烈缠斗的政治路线图。这两条对冲的政治路线图,一是新自由主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及其文化政治事件

1. 2003年小说《沙家浜》事件

2003年第一期浙江大型文学期刊《江南》,刊出一部薛荣的中篇小说《沙家浜》。2月18日《浙江日报》发表文章《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批评小说“严重践踏了人民的情感,污蔑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有严重政治错误”。3月,沙家浜镇与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以“常熟市百万沙家浜人民”的名义,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并“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的权利”。4月25日,《文汇报》发表郝铁川的文章《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其中写道:

“阿庆嫂”、“郭建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了勇敢和正义的化身。把“阿庆嫂”描写成“潘金莲”,把“郭建光”描写成“奸夫”,这就极大地践踏了为绝大多数人心理认同的民族精神,而正是在这一点,它违反了当代民法“公序良俗”的原则。

2月至3月,浙江省作协连续召开四次党组扩大会议,《江南》主编、副主编与会,决定《江南》第一期停止销售。7月15日第四期《江南》,以杂志社的名义刊登了《我们就刊发小说〈沙家浜〉的学习与认识》的书面道歉信,称:

不应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完全错误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所谓“实验文本”来取代严肃的革命文学。革命京剧《沙家浜》中的英雄形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典型人物。这些英雄形象已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不能因江青篡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成果而予以简单否定,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极端的做法是违背生活真实和革命文艺规律的。出现这一问题的另一原因是,……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导致政治把关不严,导致了小说《沙家浜》的发表,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一深刻教训,我们将永远铭记。

这一事件并非偶发的个案,事实上类似情况新世纪以来频频发生,不断冲击着“公序良俗”的底线,包括“恶搞”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雷锋、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先烈。

2. 2004年“沈崇事件”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沈崇事件”,是指1946年的平安夜,在北平东单操场,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学生沈崇一。事件披露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舆情汹汹,民怨腾

腾,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国统区五十万学生罢课反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师生挺身而出,站在斗争一线,慷慨激昂,奔走呼号,从而沉重打击了美蒋统治,配合了风起云涌的人民解放战争。

而这里所谓“沈崇事件”,则指2004年一位学者在深圳作的两次演讲,引用所谓“美国解密档案”,解读所谓“沈崇案之谜”,声称案件过程中没有“暴力痕迹”,不存在“强奸”,还转述说“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86]101}所以,结论是“政党在利用个人遭遇实现预期目标”^{[86]102}。2005年,这篇演讲还收入《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多家网站转载此文^①,引起轩然大波。美国问题专家华庆昭先生2010年4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捎带谈及这个问题^②:

2009年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前一天,国内一个知名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据说是原来发表在一家知名出版社出版的2004年中国讲座的书上。文章是给一宗1946年圣诞夜在北京发生的案件翻案的。

翻案文章自称以某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手中握有的美国档案材料为据,指名道姓说此案是“毫无强暴痕迹的‘强奸’”。而且剑指中共,说它如何将个案变成了公众事件。

华先生对出现这样的文章义愤填膺。因为,他在美国海军部亲自看过此案的美国档案,跟翻案文章所说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当时,他为撰写《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在美国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包括沈崇事件档案,此书后来以严谨厚重著称学界。他说,且不说此案据中方档案所载早已是铁证如山,美方的档案所载同样如此。至于说沈崇是地下党,引诱美国大兵,打击蒋家王朝云云,不过是国民党特务编造的拙劣桥段,当时就遭到揭露和痛斥,一时传为笑谈。而这一可笑伎俩如今又被当作学术新发现,如获至宝,广为传播,则恐怕不只是学风不严谨、学术不端正的问题了。^③

3. 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

① 例如,网易2009年5月20日编发《美国解密沈崇案:哪个才是事实真相?》,http://history.news.163.com/09/0520/11/59OK2JDE00011247.html;凤凰网2009年12月24日编发《解密沈崇案证据:一场毫无暴力痕迹的“强奸”》,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200912/1224_7180_1486072_2.shtml;等等。网络转载的谢文,标题各异,但内容均摘自《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一书。

② 华庆昭先生2010年4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学术报告,见中国世界史研究网《从收藏点到数据库:历史资料研究手段的变迁》2010年7月20日,取自http://iwh.cass.cn/news/110848.htm#。

③ 参见当年过来人的文章《沈崇事件与抗议美军暴行再回顾》(马句、宋柏)、《驳关于沈崇事件的一种谬说》(李凌、胡邦定、沙新),载《百年潮》2010年第4期;《对“沈崇案”的一点看法》(石天河),载《书屋》2010年第10期。2015年第1期《纵横》刊发《我对沈崇的一次访谈》,作者为香港文物收藏家许礼平,《新华文摘》2015年第6期予以转发,也算为此画上盖棺定论的句号。原刊“编者按”写道:

2014年12月16日,沈峻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沈峻原名沈崇,是68年前“沈崇事件”当事人……本文作者依据该事件实物资料,采访沈崇本人,撰成此文,对该事件作出澄清,以飨读者。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创刊于1995年报纸改革的热潮中,创刊号刊发的《北京最后的粪桶》一炮走红,奠定了周刊别具一格的新闻定位:关注普通人生的不普通故事,追求新闻更广泛、更持久的社会意义。创刊之初发表的作品颇受关注,包括据以改编电影的《乔安山的故事》。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社会的大转型与思想的大分流,冰点周刊“大冰点”也日益凸显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政治色彩,不断冲击主流政治的底线,直至2006年1月11日刊发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谈的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但针对的却是“反帝反封建”的近代史叙事及其政治价值。文章坚称,义和团一类反抗、斗争、革命行动属于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而帝国主义列强反倒是“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所以,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有关主管部门在责令“冰点”停刊整顿的文件中写道:“《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87]

这一文化政治事件耐人寻味的地方还在于,1月24日停刊整顿翌日,周刊编辑就在网上发表了《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回避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而将停刊整顿定性为一个“新闻自由”事件。台湾龙应台也在海外遥相呼应,剑指高层。3月1日,冰点宣布复刊,原主编、副主编免职。复刊后第一篇文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撰写,题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目了然地重申了主流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但是,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章又没有列入周刊的出版序号之中。由此可以理解为,此文虽然发在冰点周刊的版面,但不属于冰点周刊的序列文章。

如同前述沙家浜事件,冰点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八十年代以来新启蒙思潮在文化政治领域,如文艺界、学术界、新闻界一系列综合运动的自然结果,体现了如今统称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像国史专家李捷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虚无”历史,因为历史不可能虚无,而是虚无历史中蕴含的社会政治价值,亦即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道路选择。^[88]历史观与价值观在这里若合一契,形同一体,又如近代史的两范式或路径——革命化或现代化,各自隐含着整套社会政治与价值愿景。至于革命化的范式与路径,既如张海鹏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所体现的,又如林春的长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所概括的:

20世纪中国革命党和知识界的一个共同认识,是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发展出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自由的也好,集权的也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下,半殖民地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国

家政权剥夺了中国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的机会,只剩下革命一途来解决当时深重的民族、社会和个人危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没有说错:是帝国主义的干涉断送了中国的自然发展。这个判断同时亦是反帝反封建和民族解放的政治宣言。

革命为中国挣脱资本主义发展的“铁律”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的现代化也确实证明社会主义是克服落后的捷径。^[85]

其实,这也是陈独秀早就提出的观点:“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和政权,法律舆论全归无效……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89]

4. 2007年上海历史教科书风波

2006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上海市投入使用。9月1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发表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一时引发关注和激辩。翌年9月,上海市教委决定停用这套“新中国教育史上最短命的教科书”。据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等七位专家的审读结论:这套教科书思想混乱,“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表现比比皆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等。从相关报道看,教科书具体问题涉及:淡化“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如比尔·盖茨取代了毛泽东;营造所谓“和谐史”,将革命、战争、苦难的内容大幅删减,南京大屠杀只在初中部分简单提及;高中部分改用一部笼统的“人类文明史”,看不到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也不清楚拿破仑、斯大林、毛泽东等地位……

其实,这一历史叙事已经渐成主流,既同这些年央视热播的一系列剧目如《大国崛起》《走向共和》《公司的力量》等一脉相承,更与数不胜数的文章著述、解密揭秘、重写历史等遥相呼应。另外,价值失序、历史虚无以及袁腾飞一类“史上最牛历史教师”满嘴跑舌头等,不仅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不足为奇,而且此类鲜明的去政治化或再政治化意味在大学文史课堂上更是屡见不鲜。新疆大学教授高波论及的新闻学院重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情形实际上已成一种常态:

早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注重宣传讲解革命和进步的作家作品,完全摒弃其他作家作品,这固然有其偏颇。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20年来的“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所谓“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旗号下,又走了另一个极端:注重凸显那些表现文人情调、追求精致形式的作家作品,呈现为一种内容狭隘、风格疲软的“小资文学”或“文人文学”。

比如在现今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被讲得越来越多,而革命文学、左联文学、延安文艺以及赵树理、孙犁等人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再如,一部由名牌大学中文系编选的“权威教科书”、当代文学的“必读书目”,连在大陆几乎毫无影响的台湾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都选了不少,可就选没选建国后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红色经典”,其偏颇可见一斑。

更应当警惕的是,这样的偏向是打着“文学教育去意识形态化”的旗号进行的。直观地看,一些“海外汉学家”的文学观,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发挥着不小作用。而这些“海外汉学家”的文学观,在体现“西化文学观”的背后,正体现着“西方价值观”。主张在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中“去意识形态化”,有的是糊涂不知所以地被人牵着鼻子走,有的则是居心叵测,暗度陈仓地“搞另一种意识形态化”。^[90]

这里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汉学家,首屈一指的当属近些年来在国内学界炙手可热的夏志清(1921-2013)。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同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一样均属毫不掩饰地“冷战学术”,而在当代中国学界却受到最高礼遇和高度赞誉,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书店版本,琳琅满目,以至于现当代文学言必称夏志清,就像传播学一度言必称施拉姆。已故学者何满子曾借批驳叛逆文人胡兰成张爱玲夫妇而对夏志清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指斥如下,而这一认识在当今国内学界几为孤家寡人的“空谷足音”了:

(张爱玲)在不少学者和准学者之间相当风靡,这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籍华裔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蓄意吹捧。《小说史》推出于冷战初期中美尚未建交之时,是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了解中国的情况资料,以学术著作的面貌推行其反共反华的观点。当然其中也有歪打正着的部分,如阐述了被国内所冷落了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显扬了在中国只注意其学术成就的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等。但其主旨却在于颠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鲁迅传统……为了贬抑鲁迅和中国新文学,才蓄意“发现”出“西风派”和“鸳蝴派”小说的张爱玲来与之争席。匪夷所思的是,国内居然有些学者、准学者竟将夏志清的反华谬论奉为玉旨纶音,跟着起劲地叫卖张爱玲,可谓咄咄怪事。报载这部《小说史》已在大陆出版,我当时看的是台湾版,不知大陆版中是否已将那些反华反共和贬抑鲁迅的文字删掉。^[91]

5. 2007年电影《色·戒》事件

这部好莱坞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挟张爱玲之人气、激情戏之噱头,2007年登陆国内各大影院,一时媒体热炒,“好评如潮”。普通人关心原版洁版的性爱暴露镜头,文化人高

谈永恒的人性、伟大的爱情,直至首都大学生联名上书文化部——“严打汉奸文化”,人们才恍然意识到这部赤裸裸赞美汉奸的电影之历史虚无、价值混乱。在这部大红大紫的影片中,罪大恶极的汉奸丁默邨即易先生原型竟风流倜傥,有情有义,而抗日英烈、壮烈殉国的郑苹如即女主人公原型对穷凶极恶的敌伪则“春心萌动”。针对影片的新闻报道,熊蕾批评道:“2007年国内新闻媒体对电影《色·戒》几乎是一边倒地赞扬,已经可以说明近30年中国主流新闻媒体价值观的变化倾向,到了怎样的程度。”^[71]《读书》杂志一篇所思的文章《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更是对此作了力透纸背的思想透视:

从思想层面来讲,《色·戒》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这股思想潮流,本质上就是“不讲政治”,不讲性政治也不讲时代政治,消解历史意识,高扬人性旗帜,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也就是说,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才是《色·戒》影迷们的心理支点。

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色·戒》不过是个小小的例证。这股潮流的形成,或许在某些具体情境或具体作品中包含着应对舆论监管的现实策略,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革命史),以及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化的消费社会有关。它是一种自觉的,甚至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潮流。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主打的正是“人性”这张牌,它的具体表现方式往往是“情感”,并附加审美包装。典型作品如《泰坦尼克号》,那是超越贫富、超越阶级乃至超越生死、超越时间的“爱”——呵呵,唯一没超越的是性别,那会影响它的普适性。

其实,没有人能做到纯粹的“不讲政治”,无非是有选择地讲,讲什么,怎么讲,判然有别。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通过批判革命的暴力,表达个体的悲剧,来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92]

这种以所谓永恒的“人性”反衬革命的“暴力”,正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话语从控诉文革到颠覆近现代革命史的习见套路,至于用个体的悲剧批判革命、否认革命斗争的正当性、正义性、合法性,“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的文艺作品,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包括九十年代以来频频引发政治激辩的《丰乳肥臀》等小说,以及形成一次次文化政治事件的影视作品,除了《色·戒》,他如《走向共和》(2003)、《大国崛起》(2006)、《集结号》(2007)、《南京!南京!

(2009)、《金陵十三钗》(2011)等。

6. “揭秘”“解构”诸事件

2014年春晚,青年歌唱演员王芳以一曲《英雄赞歌》,将亿万国人的思绪带回激情燃烧的岁月“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王芳祖父是董存瑞的战友,父母在她出生前就打定主意:如果是儿子就叫王成,如果是女儿就叫王芳。这是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影片《英雄儿女》的人物。不料,王芳演唱一结束,竟遭到污言秽语的漫天叫骂、人身攻击、无端诋毁“整容了吧”、“跟哪个高官睡了?”……^[93]如此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的现象,这些年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断冲击着常人的心理底线。而之所以频频掀起滔天浊浪,是同种种所谓揭秘真相、解构历史的新潮话语息息相关的。这些连绵不绝的话语在近乎狂欢的乖戾心态中,“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黄平)^[94]，“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金一南)^[50]。从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真人真事,到《暴风骤雨》《沙家浜》等文艺作品,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几乎无一幸免,仿佛亿万民众参与,千百万仁人志士流血流汗的历史,都成为一部莫名其妙的荒诞剧。2013年,年届百岁的新闻学泰斗甘惜分先生挺身痛斥:

当前,我们要注意一些别有用心、在否定党的历史上做文章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倾向。比如,有些人质疑《刘胡兰英勇就义》新闻稿的真实性。1947年,我作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负责人,亲自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新闻稿编发给新华社总社。17岁的小姑娘把自己的脑袋伸到铡刀里,她的勇敢强烈地震撼了我,我相信也能强烈地震撼其他读者,她的勇敢是促使我发出这条新闻的最重要原因。稿件的原稿长一点,新华社当时主张短新闻,文字力求简练。我就把这条新闻压缩至几百字,发到了新华社总社。毛泽东为刘胡兰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新华社还播发了题字。我是这一新闻事件报道的亲历者。一些人想借此来歪曲否定党的新闻史的做法是立不住脚的,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后来还亲自到了刘胡兰的故乡,亲眼看到了那口铡刀。^[95]

与之相对,时贤与新潮又对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极尽赞美、褒扬、讴歌。如《光明日报》主办的《中华读书报》曾经发表整版文章,题为《诗人袁世凯》,而其麾下的《书摘》杂志也转发有关图书内容,称赞袁世凯如何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云云。同样,南霸天、收租院、刘文彩等土豪恶霸也纷纷“平反”,摇身一变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说道:

他们可以“同情”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地主阶级,而对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却无动于衷。在他

们的笔下,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完全是精神沙漠,而少数敏感文人的体验就足以代替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的命运。^[96]

这方面最突出的,当属所谓“民国范儿”。不知从何时起,狼烟动地、风雨如晦的民国,突然有了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范儿”,听上去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人间奇闻,莫过于此,天下戾气,于斯为盛。作家李存葆的散文名篇《沂蒙匪事》,呈现了民国一个活生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同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学术名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一样,有力表明如此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的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10]275-276}

7. 2008年“零八宪章”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动世界。22日,《南方周末》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称“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第一次公开提出“普世价值”一说。对此,哲学家赵汀阳在《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一文中予以批驳:

有的媒体认为汶川救灾所以伟大是因为向世界承诺和表现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歪曲事实的解释令人吃惊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国救灾所表现的无非是西方价值观,那么西方就不会对中国救灾所显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惊了,很显然,假如中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就根本不值得西方惊讶了。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是中国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一种发展和再创造。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圣经、奥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罗尔斯之类,也恐怕很少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在救灾英雄们身上奔腾的是中国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什么样的价值才有资格成为普世价值?什么才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很显然,没有哪一种价值能够评价另一种价值,没有哪一种价值是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标准,没有哪一种价值是最高权威,否则的话就变成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了。检验价值观的标准必定落在价值之外,必定落在话语之外,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97]

随后不久,由刘晓波牵头,海内外“自由知识分子”联合签名的所谓《零八宪章》出台,称“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并提出一套明确的政治主张:

1. 修改宪法:
2. 分权制衡:
3. 司法独立:
4. 公器公用:
- ……^①

李零在2014年的新著《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中一针见血指出,普世价值“背后是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就像新儒家“后面是典型的国民党意识形态”^{[10]247}。而如今这一普世思潮已经颇为蔓延。玛雅博士就写道“现在从官方到民间,从高层到基层,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不乏其人,在学界,普世派的声音相当强势。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党政官员,对我们国家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改革的方向也有争议,很多唱衰者其实就是‘改革者’们自己。”^[98]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也认为,“受西方思潮影响,中共党内确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99]。

8. 2009年“敦促”事件

2009年,向以揭秘解构示人的《炎黄春秋》^②,在共和国六十华诞前刊发奇文^[100],作者是位当年华东野战军的参谋。文章称毛泽东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出自他的手笔,因而文集时将“收回版权”,“物归原主”。文章一出,舆论哗然。其实,此事关键在于,纵然指挥淮海战役的当事人均已谢世,即便所谓“原稿”无迹可寻,人证物证都已缺失,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谁有资格有实力,“敦促”名将杜聿明及其麾下十数万国军精锐放下武器?小参谋还是大统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在《百年潮》上撰文《也谈〈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起草者》,提及罗竹风亲口对他谈的一个细节“敦促”一文由淮海前线新华社记者陈其五起草。陈其五(1914-1984),安徽巢县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翌年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中,任华东野战军宣传部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安徽省志》也记载道:他“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101]。

醉翁之意不在酒。“敦促”事件,不过是没完没了贬抑开国领袖的又一案例而已^③。此类说辞大多子虚乌有,但看上去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而且貌似颇有来头,如五一节口号(某高官言之凿凿声称毛泽东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后经

专家考证原始文献证明纯属无稽之谈)、毛泽东亿元稿费、《毛泽东选集》著作权(绝大多数为胡乔木代笔)……煞有介事,不一而足,以至于中央权威部门都不得不公开辟谣:

记者:前一段时间,一些网上流传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文中说,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就《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书面报告。请问有此事吗?

新闻发言人:你说的这篇文章,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全篇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

记者:这篇文章说,1992年初,胡乔木在病重期间,对探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对毛泽东著作要全面审核。还说,胡乔木提出《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及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他胡乔木的名字。文章说的这些也是造谣吗?

新闻发言人:对!的确都是谣言。^[102]

2012年8月8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们不应简单、轻率地毁掉英雄和偶像。有些重要历史人物,片面宣扬他们的所谓‘污点’,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这一个人。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一个时代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是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103]

9. 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

2012年11月29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中国梦”:

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期盼。

此后,“中国梦”成为上下热议的话题。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也就此着墨,文章主旨在最初拟定的标题中一目了然——“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于是,由此引发一场气势汹汹的风波,剑指宣传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说是删改了社论,侵犯了“新闻自由”。当然,这一事件的关键还在于“宪政”,因为,宪政一词及其所指,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已被扭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及其“普世价

① 2009年,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的罪犯”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② 《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10日发表的秋石文章《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真实经过》,又对《炎黄春秋》一篇文章中的莫名其妙说法予以了澄清。

③ 此类代表性文本有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早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建国后做过一段毛泽东保健医生,竟自称“私人医生”(中南海没有所谓私人医生),这部“伪书”出版后在美国神秘殒命;高华在香港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经济导刊》2014年8月号刊发学者马社香文章《驳高华“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对其人其作的学术硬伤予以揭露和批驳。

值”而完全不含一百年来辛亥革命、中国革命、特别是新中国宪政体制的历史性建树,如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做主等内涵。众所周知,诸如此类的政治动作在《南方周末》早已是司空见惯,以至2009年美国奥巴马访华期间,拒绝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采访,而唯独让这家地方报纸作一期专访,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此事还被视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报纸“开天窗”事件,《南方周末》在刊登奥巴马专访的一版三分之一与二版二分之一的空白位置上,留下两句相同的给读者以联想空间的句子:“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但美国官方公布的专访英文稿,同《南方周末》的文稿并没有出入。这份在九十年代市场化浪潮中崛起的另类媒体,一直在自觉呼应海内外新自由主义思潮,将“中国梦”解读为所谓“宪政梦”,其实也正符合其一以贯之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思想逻辑。对此,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一篇博士论文的分析一语破的:

在各种社会批评报道中,这份报纸基本不涉及任何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而是将1980年代末期各种精英民主的政治诉求延续至今。经常接受这份报纸采访或为其撰写评论的学者也大多是大力提倡美式民主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例如,经济学家茅于軾,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历史学家袁伟时,法学家贺卫方等等。可以说,相比于市场上主流的都市报,《南方周末》虽然常常被当作专业主义的典范,但却是一份政治立场十分鲜明的报纸。

2000年的记者节,《南方周末》推出了一个纪念专刊,其中对历史上中国记者的光荣先驱进行了点评,这份光荣名单中包括黄远生、范长江、邵飘萍、邹韬奋、徐铸成、储安平等等,所有记者无一例外都成名于民国时期的私营报刊,且大多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多人还曾在建国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受过批判。……一些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例如邓拓、穆青等都没能入选这份名单。

2013年3月17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再次系统阐述“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他还用“三个必须”,指明“中国梦”的现实路径: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104]

10. 2013年“曼德拉逝世报道”

2013年岁末,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去世,以中央电视台为典型的中国媒体,进行了一场出色的、铺天盖地的、配合西方媒体的政治宣传,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前述案例多为有意识的政治行为,那么此次大规模报道却充分彰显了新闻界的政治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对此,清华大学学者王维佳观察一天央视直播报道后,写下一篇令人深思的文

章《中国媒体如何报道曼德拉逝世》:

短短几个小时内,电视新闻的编导能够制作出这么政治定位鲜明、情感充沛饱满、内容资料丰富的电视片,实在让人赞叹。

南非的种族和解不是哪个英雄人物缔造的结果,更不是冲突双方本着和平的意愿自然形成的结果。曼德拉固然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有着高尚的人格和巨大的魅力。但是这位在冷战发展关键阶段被困于牢狱之中毫无行动自由的老人,不可能给1990年代南部非洲的政治局面带来决定性影响。他只不过是新的政治条件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很容易被塑造成民主和平偶像的最佳人选而已。曼德拉入狱前和入狱后的两个年代,不仅对南非来说是各种政治条件极为不同的时代,对整个世界来说同样如此。南非人民为了解除种族隔离而做出的努力奋斗从来都不局限在这个国家内部,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起到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

翻阅相关的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就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通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每一封回复给对方的电文中都对这些抵抗运动表示出毫无保留的支持。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中国、苏联和古巴等国对南非周边多个国家民族独立和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持续支援,离开这些国际力量对南非国内抵抗组织的直接帮助,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不可能获得长期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如果我们像今天的新闻报道一样,把南非种族间的最终和解完全归结于开明政治人物的相互妥协,就等于掩盖了中国曾经参与其中的,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主义力量支持非洲人民抵抗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而这恰恰是欧美国家乐见其成的舆论导向。

如果我们能够对南非种族间和解的长期历史做出复盘,就可以很容易发现媒体报道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首先,媒体动辄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电视新闻和占据数个版面的成千上万的报道文字,并没有透过曼德拉这个个人看到真正的历史过程,而是用尽全力、不厌其烦地去塑造一个“全球公民典范”,一个似乎是凭借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够促成世界和平的个人英雄。可以说,这样的舆论效应,正是欧美国家大力抬举曼德拉想要达到的目的。

其次,媒体的报道竭尽全力展示曼德拉“和解”的“非暴力”的一面,不仅掩盖了历史事实,而且通过在政治理念上否定暴力与和平的辩证法,显露了明显的保守立场。在这样的报道框架下,一个人生史被有选择地展开叙述:那个年轻的、危险

的、革命家的曼德拉未曾存在,而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曼德拉则永世长存!

最后,在曼德拉的故事中,媒体所强调的政治正确性是一种基于种族身份平等的承认政治。似乎南非社会的所有矛盾就集中于不同肤色的人是否能够消除歧视和隔阂,相互尊重,只要基于种族肤色的矛盾解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建成了。在忽视非洲大陆整个殖民历史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前提下,这样的叙事很容易建立起来。……然而,冷战后的和解,正像今天媒体宣传的论调一样,将南非社会的根本矛盾归结为种族歧视,只要解决了承认问题,就等于解决了社会矛盾问题,几百年的殖民和殖民的遗产就一笔勾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关于曼德拉和南非的媒体报道框架仍然“无意识地”起到了掩盖社会根本矛盾的作用。

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现象在这一整天有关曼德拉的媒体报道中绝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普遍倾向。行文至此,我自己也感受到媒体的可怕力量,这些有意无意地鬼蜮伎俩通过每一个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塑造着大众的政治观念,成就一种简单而保守的舆论氛围,让重要的政治讨论和重要的历史事实被排除在公共视野之外。^[105]

以上有整有零列举了十个案例,而类似案例其实大同小异,不胜枚举。这些案例的共同点与着力点,都在于历史观、价值观与世界观,而这也正是此路再政治化的核心。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所言“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1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政治进程

与上述再政治化路线相对的这一再政治化路线,无疑声势浩大,也更加引人注目。毕竟,前者终归是散兵游勇的游击队,而后者属于兵强马壮的正规军。当然,正规军不敌游击队的结局在历史上也不罕见,所以,意识形态领域这场不见硝烟的交锋眼下还难说胜负。如果说意识形态归根结底针对着世道人心,那么意识形态的“战果”最终还是得看人心向背。下面先简要梳理一下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进程。

2004年: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全面启动。这一俗称的“马工程”涉及九大学科包括新闻学,主要致力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理论推广、思想传播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牢固坚实的思想根基,故有党和国家的“一号工程”、“生命工程”之谓。

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如今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各种形式如火如荼推展开来。

2010年:云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在《红旗文稿》连载发表,可以说体现了执政党对文化政治问题的

系统思考、全面审视和深刻把握。

2011年: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

2012年:党和国家以三十多年来罕见的规格与规模,隆重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包括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等。人民日报任仲平发表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第一次系统阐述党的文艺观,第一次明确表明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次科学回答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所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自有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著作。

从《讲话》到《决定》,从革命文艺的雄壮乐曲到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从文化唤醒民众、文化发动民众到文化服务民众,“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07]

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8·19讲话”,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思想。他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把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手抓紧抓牢,中国发展才能有更为扎实的根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014年:秋风送爽时节,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铁凝、尚长荣、阎肃、许江、赵汝蘅、叶辛、李雪健等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长篇讲话,如同72年前毛泽东主持并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公开报道,习近平讲话的主要精神包括: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108]

2009年新中国六十大庆之际,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发起“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得到专家学者、干部群众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最终入选的“环境危机凸显”、“贫富差距拉大”、“基层干群冲突”等十大挑战中,“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名列其中。由此看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已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的生死攸关,迫在眉睫。而如何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目前还任重道远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其间,马克思所谓每日每时干预社会生活的新闻传播关系尤大,特别是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的二元化新闻体制,以及新闻观、新闻学、新闻教育等内在变异,无不隐含着矛盾重重、隐患深深。苏联解体,殷鉴不远,也就更令人多一层真切的现实感与深切的危机感。

(三) 新闻雾霾危及国本

言及当今新闻界,似乎无人不指摘,而对其中主要问题及其症结,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个最受关注的问题当属新媒体,以及传播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分化、动荡、危机。由于新媒体新技术的革命性冲击,许多人意识中似乎不由自主,甚至不假思索地假定了看似不言而喻的前提:所有问题无不源于新媒体、新技术,不管是新媒体造的福,还是新技术惹的祸。于是,一窝蜂涌向新媒体,一股脑琢磨新技术,就像目前盛行大数据、云计算、媒体融合等流行语。然而,眼见新媒体疆域彩旗飘飘,鼓声阵阵,千军万马,声势浩大,苦心孤诣经略了十多年,非但未见扭转战局,反而愈发陷入被动。换言之,琢磨了十多年新媒体、新技术,问题非但没有缓解,更不用说解决,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有鉴于此,是否需要换个思路看问题呢?站在地球上,看太阳显然绕着地球转,而从太阳系中看,则地球其实绕着太阳转。与此相似,新媒体的问题及其根源表面上在于技术形态,而实际上还是在于新媒体所由发生发展并环绕不去的现实社会,具体到新闻、文化或传播,新媒体的问题及其根源还是一种精神恍惚,失魂落魄,亦即所谓核心价值观日渐消解、式微或沦丧。认清这一点,首先需要破解那个看似不言而喻的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前提——一望而知又是一个去政治化的逻辑。

对此前提及其逻辑,可从两方面辨析,一是技术,一是社会。技术上,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教授在质疑互联网的系列文章中作了入情入理的深入剖析,如《那条“长尾”其实是虚幻的》(2010)一文对蛊惑人心的“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的批驳,无异于在一切为新媒体兴高采烈、为新技术呼风唤雨的乌托邦热望上酣畅淋漓浇了一桶冷水。他以吃饭设譬,平常人家一顿饭四菜一汤已经比较丰盛,如果加到一百个菜如何,一万道菜又如何,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有限的生命、时间和精力来说,长尾理论的“无限选择”,不仅完全没有用处,而且还是荒谬的、有害的。^{[109]45-50} 尽管互联网、新媒体提供了理论上的无限可能以及浩如烟海的选项,可实际上也使古老的选择问题更为凸显。一个人吃什么不吃什么,看什么不看什么,在千万亿海量选项中显得何等渺小,无奈,微不足道。于是,新闻与新闻学的存在前提及其逻辑——选择,即在林林总总的事实中选择报什么而不报什么等,不仅未像有人急煎煎、想当然宣称的化为乌有,反而愈发突出,愈发重要了。所谓自媒体、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麦克风的“信息共产主义”,不过是听上去很美的海市蜃楼,启蒙主义乌托邦的又一场南柯一梦:

不错,当冯小刚说“微博就是我的冯通社”时,他的感觉不是幻觉,因为他是名人,他的微博会有千千万万人关注,所以他随便发一句闲言碎语,确实“全世界都能看到”。但“发言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是指你说的话能够被公众听到。谁都明白,如果你对着墙壁说一句话,这不叫发言权。那么千千万万芸芸众生的微博,“全世界”有人去关注吗?^{[109]45-59}

从社会方面看的一个显见问题是,由于一味琢磨新媒体,便自然而然将“为人民服务”变成“为网民服务”,无形中网民等同于人民。尽管明眼人心里头也清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可实践中或潜意识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网民与人民视若一体,混为一谈。于是,但见从政府到媒体、从业界到学界,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一天到晚,长年累月,围着网民打转转儿,包括《焦点访谈》等栏目也常常忙不迭地听风是雨回应着微博微信的闲言碎语,甚至让所谓大V时时处处牵着鼻子走,一惊一乍,不遑宁处。

稍作分析即可明了,网民不过是人民中的特殊群体,在人口学意义上根本无法等同人民大众或人民群众。王绍光曾举美国学界的话说:世上有三种谎话,一是谎话,二是无耻的谎话,三是数据。^[110]如果对数据不进行历史的关照与哲学的反思,那么任何数据包括时下风行的大数据、云计算便如自然万物一样,不仅什么都说明不了,而且有可能成为似是而非的大忽悠。遗憾的是,这种风气挟实证科学之势日渐盛行。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半年发布一次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为例,如今常见征引诸如如此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全国网民达到6.18亿,网络普及率45.8%等,以此说明新媒体何等沧海横流,如何改天换地。这种空洞的数据,就缺乏一种历史的、社会的、人间烟火气的洞察。别的不说,仅看网民构成与分布:上述同一时段,20岁至49岁者占67.2%,高中以上学历者占52.1%,有固定收入者占86.7%,绝大多数分布在北京、上海及中东部省份。^[111]也就是说,网民的主体为年富力强之人,不仅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而且大多集中在发达地区,特别是城镇。郑永年教授世纪初的结论,在新媒体瞬息万变之际依然适用“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都位于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例如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这种情况自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发展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不太可能会改变。”^{[112]53}

2014年清华大学博士生、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王晶研究历年CNNIC统计报告后发现,即使网民群体逐步趋向多元化之际,在所有阶层中也是严重不平衡的。汝信、陆学艺和李培林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勾画了当代中国十大阶层,而按照当年统计,前八个阶层的人数比例为52.9%,其余农林牧渔劳动者为4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当年CNNIC数据显示,农林牧渔网民只占总数1.3%。即便在农村网民快速增长的今天,农林牧渔劳动者也仅占网民总数6.6%。^[113]王维佳、杨丽娟研究新浪微博上的“吴英案”讨论也发现类似问题,高达88%的博主身份为学者、媒体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律师,也就是说都市精英与知识分子占据绝对优势。作为网络舆论的意见领袖,这群活跃的公共政治议题参与者掌握了相当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对重要公共事件的态度和判断高度一致,在网络上具有巨大的舆论动员潜力。^[114]在《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一书中,郑永年教授也写道“网民几乎不能代表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

男性。”^{[112]26}

无论是实证性的研究,还是常识性的感受,无不表明网络舆情看上去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实际上既不能代表亿万人民的现实民意,特别是农村基层、城市平民、老少边穷、少数民族等,甚至也并非全体网民的真实诉求。貌似中性的技术根本不是人人平等的工具,而往往成为区隔社会的壁垒,就像私家车与自行车或如私家车中的高档车与低档车。与此相似,即使暂且不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等,仅就传播技术而言,历史与现实也无不显示,越是高科技,越是新媒体,就越是形成传播空间的社会分层,就越是可能形成新的话语权力的金字塔而不可能成为全体人民参与的“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舆论场中,普通民众即便偶然发声,也如汪洋大海里的一朵浪花,即生即灭,无声无息。事实上,作为“高精尖”“高上大”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场,新媒体更多属于“大嗓门”及其追随者即所谓“粉丝”的意见平台或狂欢舞台。这里,信息沟意味着少数人的发言权、话语权越来越强,而多数人的发言权、话语权越来越弱。国外一系列相关研究结论也说明了这一点:

新兴的信息技术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

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也阻碍了有效的公民参与。因为信息技术,例如电子邮件、新闻组(Usenet)和互联网,是不均衡分配的,滥用的和设计来使不对称权力关系具体化的,所以它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秩序施加了巨大的阻碍,而非推动一个强健公共领域的发展。

进入一个数字化公共领域的门槛很高,这包括了获得或购买价格高昂的硬件、操作和驾驭新媒体环境所需的大众文化普及,以及有效参与公共领域讨论和辩论所需的高级阶段的学习,即沟通技能和批评性思维。因此,许多处于下层阶级的人无法参与公共交流和政治活动,也无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发出他们的关切和需求。^{[112]101-103}

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状况,积极应对新媒体的时候,就不能不调整战略性研判失误,特别是将网民等同于人民,就不能不更多关注“无声”的亿万人民及其心声。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忽视真正“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他们才是人民共和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与政权正当性的源泉,正如“人民当家做主”一语所示。清华大学博士生苗伟山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撰文的实证性结论,也说明了这一点:

网民不能代表中国大众,正如卡斯泰尔(Castells)论述,中国互联网络上对民主追求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根据《社会蓝皮书:2014年

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互联网中300名左右的意见领袖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起到重大作用。……网络使用主体的特征因此决定了线上和线下的巨大反差,正如网络上一则广为流传的微博“如果你每天看新浪微博,你会感觉中国明天就会爆发革命。如果你每天去菜市场,你会感觉中国一百年之内都不会发生革命。”^[115]

由此可见,新媒体也好,新技术也罢,虽然对当今社会形态与新闻生态构成显而易见的冲击,但新媒体并非新闻舆论场乱象丛生的根源与症结,网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网下,真正的问题及其根源在于新媒体之外的社会,特别是文化政治的混乱与失序,新媒体说到底无非体现、放大与传播日益混乱与失序的文化政治。如今,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突出现象是,各级新闻宣传主管部门一天到晚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一事一决,辛苦备至,可惜只顾关注下游的“险情”,左一道指令,右一通提示,而往往无视也无暇顾及上游的“洪峰”。结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何谓上游及其洪峰?概言之,就是所谓“立主脑”(李渔《闲情偶寄》),其中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人与思。人之不存,思将焉附;思之不存,人将何谓。而这一上游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价值。如同前述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再政治化表现,新闻传播再政治化也集中于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新闻观无非是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体现。在记者群体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总体上日益偏倚与变异之际,任何关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想法与做法,包括中宣部、中国记协大力推动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三贴近”、“走转改”、“校部共建新闻学院”,以及通过指定书目的背诵和考试而换发记者证等规定动作,充其量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因为根本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主脑,问题出在下游而根子源于上游。而时下貌似成为主流的一套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即使从乐观角度看也无非沉溺于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就像文化学者黄纪苏的形象比喻,停在三十多年前的历史方位“原地踏步”,踏出的深坑快把自己活埋了。^[116]至于精英媒体与媒体精英的“改弦易帜”,更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综上所述,如今媒体与舆论环境的乱象丛生,包括2013年《新快报》为其记者陈永洲涉嫌虚假报道而被警方拘留一事,先是叫板“敝报穷骨头还有那么两根”旋即公开道歉的闹剧,2014年警方披露原《21世纪经济报道》网络版“21世纪网”大规模新闻敲诈的利益链,央视财经频道郭振玺、芮成钢被查等,除了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腐败、新闻欺诈等利益问题,追根溯源乃在于观念形态的混乱与价值体系的失序。借用王岐山谈论反腐败的“三段论”,如果说反腐目标依次为“不敢贪”(惩罚机制)、“不能贪”(制度约束)、“不想贪”(精神情操),那么,应对新闻乱象的最高境界也应在于记者及其观念所决定的“不想为”。而目前状况却如潘维教授所说的“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117]。这一尖锐判

断与赵鼎新教授所见略同“在目前的中国,国家和媒体的关系并不是很坏。虽然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良好的今天,绝大多数记者基于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最多也就是打打‘擦边球’。但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118]这无异于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当上上下下朝朝暮暮惊扰于新媒体的“狼来了”之时,殊不知无论新媒体旧媒体,把握话语与话语权的其实同属一类人以及同一类政治意识形态。如果人还是同样的人,观念也还是同样的观念,那么新媒体、新技术只能使问题更多,乱象更甚,而绝不会由于掌控了新媒体、新技术,就一举化解新闻传播的乱象丛生。一句话,关键不在于新媒体或新技术,看看新媒体大本营美国就知道了,而在于人与思即主脑,在于记者及其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需要强调的是,人与思的问题并非天然如此,更非本性如此,没有谁天生离经叛道反潮流。观念形态的形成除了现实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如贫富差距、官员贪腐、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等,更是由于日复一日的新潮思想熏染,一点一滴的文化价值塑造。一些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如今占据新闻媒体咽喉要道的骨干精英就不说了,且看一批批80后、90后学子从学校课堂上接受的新闻教育,到现实中接触的影响其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书籍、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更不用说网络手机新媒体,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等观念形态,究竟还有多大意义,不是众所周知,就是天知道了。至少,新一代心目中的偶像早已不是“勿忘人民”的穆青等人民记者,而是以其显赫身份乐此不疲地充任新贵势力喉舌并汲汲于谋取个人名望利益最大化的新闻明星了。再以新闻院系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如今从开题到答辩的流行模式是:首先,得有一套理论,而所谓理论无一例外都是西方学者的思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的观点,中国学者的任何研究及其成果不入这个理论法眼。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曾为博士生开列20部参考书目,除华裔加拿大学者赵月枝的《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一度全是西方学者甚至主要是美国学者的著述。而类似情况在各大新闻院系大同小异。这也印证了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的判断:自然领土是自己的,而人心的领土差不多成了别人的。^[119]其次,得有方法,而所谓方法通常来说无非是定量统计一套实证路数,除此之外的其他研究路径都不能算方法,至少不算“科学方法”。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或科学至上主义。科学的功用值得相信,但科学的主义不必迷信。看似悖论的一点是,当国际国内的前沿学术思想对科学的局限与问题越来越清醒之际,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对科学的迷思却越来越浓重,仿佛只要祭起科学的大纛,便可横扫天下无敌手了。三十多年前,施拉

姆的冷战学术——传播学,就是以“科学”之名在中国内地盛极一时,并使“不科学”的新闻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体现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学术话语退居边缘,直至消失殆尽。如今,美国实用哲学基础上的一套实证方法又以“科学”的说辞,恨不得驱逐一切“非科学”的方法,把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也弄成一间巨大的实验室,堆满瓶瓶罐罐的“试剂”,汇集林林总总的“样本”。江晓原教授在《科学的三大误导》一文中论述的问题,简直就像针对新闻传播研究而言的:科学等于正确、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120]2007年一份由院士集体通过,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名义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已经态度鲜明地表示“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而当下新闻传播学,却依然把科学及其方法奉在珠穆朗玛峰上顶礼膜拜。最后,在西方或美国现成理论与一加一等于二的方法基础上,再将中国的某个新闻传播案例套入其中,从而证明或证伪西方的理论。不仅新闻学子的论文多为这一套路,就连一些学者文章也大抵如此。虽然此路研究及其著述即便如一朵奇葩不无价值,也不否认其存在意义,但总不能以一花独放而扼杀百花齐放,更何况如此僵化刻板的党八股、洋教条,同陷中国革命于绝境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何本质区别。难怪潘维教授疾呼“中国未来如果垮掉,中国模式如果失败,很可能(同苏联一样)也是败在思想战争。”^[121]再看看学界貌似形成中世纪欧洲教会似的“独立王国”,包括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独立”的机制和“自由”的理据如“价值中立”,使得“非我族类”的东西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既以文化权力而同政治权力分庭抗礼,又对青年学子与学者形成不得不就范的精神压力与利害关系,从而让官方的文化领导权往往形同虚设,常常悬置半空,就知道这样的忧患之声并非空穴来风,更非危言耸听了。

鉴于新闻界以及新闻学越来越成为再政治化的主阵地,新闻、媒体、传播等也就自然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关切”。2014年,《经济导刊》编辑部举行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既是这一“核心关切”的一次集中展现,又对其中关系重大的社会政治与新闻命题,进行了富有洞察的战略思考并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难得一遇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会上,近二十位海内外各路专家学者,对中国媒体的病症与病灶作了力透纸背的解剖,《经济导刊》也用三期连载了其中一些要点,其编者按语将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严重偏差的新闻传播现象称为“重度雾霾”,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122]这里,不妨辑录其中一些精华思想。

熊蕾: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今天中国媒体有很多人玩世不恭,要不就是和当权者掐着干。你让我往东我非得往西,哪怕我不得不顺着你的意思评论,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得把你讽刺挖苦一通。某些媒体毁人的本事真不小,甚至还有把人逼疯的本事。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沦陷为西方的工具了。可能还不能说是沦陷,但是离心离德的情况非常严重,或者说是貌合神离。

这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甚至有些相当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在追逐私利,你要媒体保持社会良心,我觉得很困难。不排除有些从业人员还有这份良心,但是社会大环境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让有这份良心的人非常难。

不光是媒体,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在宣扬“普世价值”。可是宣扬“普世价值”这么起劲的人,却有一点就是不跟美国接轨。美国的知识精英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而这些中国知识精英认同度非常低。看到有人对国家利益认同,他居然能说出“爱国贼”这样的话,恶骂你。但是美国从媒体到科研人员,跟中国同行们完全不一样。

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指出中国金融对外资开的口子太大,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风险,结果文章被禁止发表,哪怕在内参上都不能发,就能这样封杀。所以我认为,中国媒体的现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22]

李希光:中国今天舆论的背后是什么?

传统新闻界,特别是有影响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新闻标准和政治标准上出了偏差。过去几年来,每当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几乎没有自己的议程设置、新闻立场、新闻语境、新闻语言和政治正确性标准。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基本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所讲的政治标准了,而是照搬西方媒体的观点、立场、语境和语言文字。有的时候,我们在收听国内某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时,还以为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呢。

当年媒体和网络一哄而起,猛烈炒作温州动车事故,攻击高铁和铁路部门。事实上,温州当时还没有铺设高速铁路轨道,高铁是2013年7月1日通车的。但是一些公知和媒体联手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高铁是杀人列车”。严格讲,铺在专用铁轨上的“高铁”是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比汽车、飞机和其他国家的火车和铁路都安全。但问题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的一些人胆怯了。

微博问政非明智之举。有人说,开办微博只有两个作用,要么去骂别人,要么等着别人来骂你。官微开办后,政府的相关领导就再也睡不成一个踏实觉了,每天都被微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牵肠挂肚。时时刻刻要看看大V们在官微上说了啥、大V

的粉丝们跟帖说了啥。结果大V和他们的粉丝们在围观和围攻什么,党和政府就得去关注什么。按照议程设置理论,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只要关心别人提出的问题,你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怎么面对微博最好呢?最好是釜底抽薪。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干部都不要去看某些机构编写的网络舆情,也不要去看微博;重新回到群众路线上来,走到网络之外的群众中去,了解没有被网上的资本力量操纵和篡改的社情民意。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而那些试图靠微博来改变党和政府正确决策的境内外政治、经济势力,就没有市场了。^[122]

李北方:保障人民“被听到的权利”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我国的媒体在整体上很让人失望。从如今的媒体生态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的媒体。这一类媒体有各种类型的形式,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模式,包括国家名义上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比如所谓的“南方系”和大多数的都市报),也包括绝大部分新媒体(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这些媒体几乎完全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外资势力的代言人。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它们也形成了一整套制造话题、炒作话题的机制,薛蛮子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不那么强的媒体,也就是国家控制程度还比较高的那些,姑且称之为体制化取向的媒体。老实说,这些媒体过于死板,对人民群众缺乏感召力,对有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声音缺乏战斗力。国家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而向这些媒体的大量投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这样的媒体现状下,人民群众“被听到的权利”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宣传部门应该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有所改进,比如近期媒体上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但是表现形式需要推敲,质量亟须提高。这里需要遵循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精神,首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倾听人民群众声音的前提下,拿出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述;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公共空间,与其他声音一起构成完整的舆论生态,一起完成议程设置。^[122]

刘瑞生:人家对准你的下一代,你怎么应对?

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什么特点?很多人很幼稚地期待网络舆论是自由民主的,是代表民意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例如新浪微博这样庞大的舆论场,真正主导其导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少数意见领袖。这说明,舆论导向完全为少数人所操控,而其最深层次的影响是政治倾向。在诸多微博舆论

热点事件中,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八九成都是具有一定自由化倾向的“公知”。特别典型的是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非常明显,这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几乎全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有组织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南周事件”是给新一届中央领导施压、在规模和参与方式上都有所突破的“2013年第一社会公共事件”。总之,在资本、技术和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下,网络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变量”。

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分化的问题严重。市场化导致主流媒体去创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媒体的政治分化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党内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猜疑。为什么有些媒体被西方称为“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为什么有些鼓吹普世价值、颂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和歪曲中共党史的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网络自由主义不过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延伸而已,根子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歧。^[122]

潘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

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

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

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123]

乔良: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这和政府导向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想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

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造成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国内不少媒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精神错乱。

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走

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和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化为泡影。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123]

黄平:诉诸群众,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

记得很早中央就提出,要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就算国家牢牢掌握着主流媒体,但是如果各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什么人看,甚至连干部都不认真看,那也没有多大用。

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多少人信,而是商媒、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甚至有些官媒背后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中,也把西方的标准当成了我们的标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也丢失了。

我们的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失语的,有人说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123]

赵月枝: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力

媒体政策部门、学术界和主流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把媒体的市场机制理解为政治上中性的经济化约主义。更有甚者,媒体市场中的消费者被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这是典型的市场民粹主义立场。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党派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英国报业史。……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Media and Power*)一书中有深刻分析(这本书在国内早有翻译)。卡伦引用了英国报业史上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拥有474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意味深长的是,这份报纸的读者人数比另外三家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报纸——《泰晤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读者总人数多出将近一倍。

令人深思的是,在国内的传媒政策界和学术界,不但有很多人在抽象地讲放开市场等于更多的媒体自由,而且还有不少天真地希望通过“占领媒体市场”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某些人以为占领了媒体市场就能建立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表明新闻媒体界思路的不清醒,其最终结果将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中国改革最终南辕北辙。

媒体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未必是人民传播权利的实现,反而会让本土与跨国资本假自由之名,抢占本该属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传播空间。天真地期待媒体机构与国家分手,并通过市场逻辑的运作成为监督国家的“第四权力”以及为民请命的“包青天”,既忽略了更深层的传播政治经济分析,也可能掩盖媒体机构本身与广大民众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当下,媒体表达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实际分配非常不平等,不同社会个体的表达能力也极不平衡;媒体机构本身已被商业化,并在此过程中催生了既得利益群体,而新的资本拥有阶层也已形成。

新闻自由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言论表达的自由,而在于谁的自由——是媒体拥有者的自由,还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谁的需要——是商业牟利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还是人民言论表达的需要?在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里,表达自由是被阶级关系构建的。今天,在对信息化资本主义所深陷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行反思的时候,如何实质性地把民众的表达自由原则贯彻于一个新旧媒体相互融合的传播体系中,是美国维系和深化民主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同时,这也是中国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划时代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走出一条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促进世界传播民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痴人说梦。^[68]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即使眼下文化政治与新闻传播发生了一系列变异,显现诸多值得忧思与反思的问题与想象,但大多数普通新闻工作者依然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使命,信守着人间正道与新闻理想,承担着大量日常的新闻报道,就像一批张严平、陈中华、王慧敏、何盈似的记者,从而使新闻传播的大船在激流险滩中依然沿着主航道奋力前行。对此,还是得有充分估计和基本判断,否则就无法解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展现着越来越清晰的前景,越来越光明的未来。

四 不是结语的结语

本文开篇提到鲁迅先生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新闻传播一路风风雨雨,发生了惊心动魄而润物无声的变化,沧海桑田,欲辩忘言。这里,只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对专业领域的演化及其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略作探析,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一片烟云中,瞩望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变革之轨迹、踪影与脉络:新时期新闻传播路如何一步步走过?经过哪些沟沟壑壑,曲曲折折?又有哪些令人怀想的光荣与梦想,朝乾夕惕的顿挫与沮丧?特别是,如何从习近平所言“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124]这一总思路与连续统上把握新时期的新闻传播,更是兹事体大的学术课题与思想命题。为此,勉力提炼并试图描绘了八十年代高度政治化、九十年代去政治化与新世纪再政治化的粗线条,由此贯通并显现新时期以来新闻传播的大转型、大趋势。其间,对于社会政治问题而言,无论采取什么立场,不管秉持什么主张,说到底无不围绕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或核心政治,具体而通俗的说法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干扰之,要么坚守之,要么祛除之,要么复兴之,要么不情不愿,要么自觉自愿,所谓文化自觉以及相应的学术自觉,首先离不开这种政治自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三十年来步步演进,中国社会也许又抵达一个历史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撰文提议,早日做出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问题与失误,如同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明确什么是要坚定不移坚持的,什么是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停止的,什么是应该纠正的:

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难以完全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波动性带来破坏和浪费,甚至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贫富差距扩大;还有些地方把教育、医疗、住房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盲目推向市场,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出现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问题根源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过于强调市场经济,忽视了其社会主义属性,导致盲信市场、大肆私有化等错误思潮泛滥,并引发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贪腐横行、环境污染等问题。^[125]

国防大学教授卢周来2014年发表文章,也从政治经济学上“呼唤新一轮思想解放”:

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圈内,批评资本与企业家,与为政府合理行为辩护,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可能危及“饭碗”的高危行为;而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市场化不够,政府管

得过多。包括波兰尼批评过的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远远不够”。

所以,要发起社会保护运动的前提,也可能是需要一场类似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的思想再解放。

与35年前的思想解放相比较,这一轮思想解放应该有自己的特色。35年前,因为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几乎剪除了一切利益集团,改革的最大阻碍其实来自于传统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观念,因此,改革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头。35年后的今天,对收入分配这项事关中国未来的大改革,阻碍最大的已不是旧观念,而是既得利益——这恰与35年前相反。因此,这一轮思想解放,也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高树公平正义这杆社会主义旗帜,以观念凝聚共识,以主义的旗帜汇聚力量,去压倒特殊利益集团,去拆散旧既得利益格局。^[126]

就新闻传播以及更广泛的思想文化来说,回望新时期,最大问题也正在于邓小平提醒的“一手硬,一手软”。如今,不管是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东解体的巨大悲剧,还是回味葛兰西所论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思想,不管是探寻新中国的立国之路,还是领会共产党与共和国领袖对文化政治的深邃思虑,都让人更真切体会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的要义。如果说,既往一切社会形态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大多来自血亲血缘、宗教神学、强权暴力等,那么现代政治则往往奠基于凝聚人心而天下归心的文化政治之上,特别是一整套哲学意识形态——“主义”,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称之为“政治的哲学化”。借用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的话说,“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127]而意大利学者弗朗科·里沃尔西说得更直截了当:

阶级冲突的真正战场不在别处,而在于是否有能力提出一种独立的、广为传播的世界观。而这正是“领导权”所涉及的领域,在这里,所谓领导权就是阐发和传播具有聚合力的那样一种思想的能力。^[128]

新时期——或已成为一个名实渐远的时代,而新时期落幕,中国梦开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创作“他最伟大的作品”(陈晋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曾经满怀豪情地说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什么时候,中国的媒体、中国的记者、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都能够自觉自信地挺起脊梁,重树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精神旗帜,而不是汲汲于产业效益、做大做强,更不是一心追攀普世价值、国际接轨的海市蜃楼,甚至驴唇不对马嘴地将中国梦解读为变相的美国梦,民族复兴才可能真正拥有保驾护航、凝心聚气的传播利器。一百多年前仁人志士的暮鼓晨钟,今天听来依然振聩发聋——“国之利器,不可假人”(陈炽)。

(本文修订过程中,王维佳副教授几次提出颇有见地的意见,并起草了几处独具慧眼的文字。另外,博士生李海波不仅仔细审核了全部文献与文字,而且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谨此说明并致谢忱。当然,文中的一切问题自当由笔者负责。)

参考文献:

- [1]景跃进.丛书第一辑总序[M]//“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文化纵横》编辑部.利益政治时代的到来[J].文化纵横,2014(2):18-19.
- [3]陈力丹.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 [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 [5]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
- [6]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14-27.
- [7]黄平,姚洋,韩毓海.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J].天涯,2006(3):20-32.
- [8]王学典.启蒙的悖论: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N].中华读书报,2014-08-06.
- [9]祝东力.两个周期内的中国——1990年代初以来经济社会与思想简评[J].文化纵横,2014(4):33-37.
- [10]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 [12]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1):157-159.
- [13]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14]郭齐勇.守行蓄德,光前裕后——汤一介的人与书[N].人民日报,2014-08-12.
- [15]王学典.启蒙的悖论: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N].中华读书报,2014-08-06.
- [16]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2.
- [17][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916-917.
- [18]黎明洁.叙述学视角下的新闻写作改革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4.
- [19]季萌.新时期中国报纸主要新闻文体流变[D].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
- [20]童兵,陈绚.中国新闻传播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305.
- [21]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247.
- [22]新华社上海分社.我们怎样改进采访写作[J].新闻业务,1956(5).
- [23]寄晨.在工作中感到的几个问题[J].新闻业务,1963(1):3.
- [24]穆青.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设想——同新华社四川分社负责人的一次谈话[M]//新闻工作散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365.
- [25]张持坚,蒋耀波,谢金虎,主编.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散文式新闻选萃[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序言”.
- [26]樊云芳,丁炳昌.新闻文体大趋势——“全息摄影”(上)[J].中国记者,1988(1):33-35.
- [27]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 [28]张珂.一次信仰寻根与新闻回归之旅——读报告文学《曙光中的足迹》[J].青年记者,2014(23):28-30.
- [29][哥]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M].朱景东,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26.
- [30]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32-140.
- [31]房宁.当代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演变[M]//潘维,廉思.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21.
- [32]苏晓康.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J].文汇报月刊,1989(1).
- [33]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原为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选》的自序.
- [34]杨振宁谈《河殇》[N].人民日报,1988-10-16.
- [35]李政道.读《河殇》有感[N].人民日报,1988-11-04.
- [36]殷允芾.经济开放不是万灵药[M]//崔文华.海外《河殇》大讨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 [37]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3,9.
- [38]玛雅.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8:345-346.
- [39]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J].书城,2010(11):36-39.
- [40]柴静.把世界呈现出来已经了不起[M]//南方都市报.十人:大时代中的我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163-178.
- [4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05-506.
- [42][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43]西川.死亡后记[J].诗探索,1994(3):88-97.
- [44]苇岸.诗人是世界之光——关于海子的日记[M]//

- 转引自 余徐刚. 海子传.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289.
- [45]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2002.
- [46] 强世功. 政制发展之谜(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三[J]. 读书, 2009(2): 49-55.
- [47] 王小鲁. 电影政治[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 [48] 昌耀. 昌耀诗文集[M]. 增编版.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665-674.
- [49]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70.
- [50] 金一南. 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挑战[J]//本刊编辑部. 问题中国,进步中国——关于制度模式选择与话语体系构建的研讨. 经济导刊, 2014(8): 10-14.
- [51] 朱学勤. 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N]. 南方周末, 1998-12-25.
- [52] 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 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 理论参考, 2004(12): 25.
- [53] 陈众议. 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为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而作[M]//“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5-2007: 代总序.
- [54] 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 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352-353.
- [55] 程恩富.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J]. 求是, 2005(3): 38-41.
- [56] 吴立波. 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J]. 瞭望东方周刊, 2004(2): 12.
- [57] 刘擎, 沈亮. 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崛起: 掌握财富和社会资源[J]. 瞭望东方周刊, 2006(1): 4.
- [58] 《新自由主义评析》出版座谈会简报[EB/OL]. 凯迪社区, 2004-07-04, <http://club.kdnet.net/disppbbs.asp?id=181721&boardid=24>.
- [59] 汪晖.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M]//汪晖. 去政治化的政治: 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98-160.
- [60] 郑永年, 钱继伟. 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 [J]. 文化纵横, 2014(4): 20-26.
- [61] 甘阳. 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M]//陈祖为, 梁文韬. 政治理论在中国.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218-232.
- [62] 郑永年.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M]. 郁建兴, 何子英,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186.
- [63] 《文化纵横》编辑部. 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J]. 文化纵横, 2014(4): 19.
- [64] 单波.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8.
- [65] 陈力丹. 从三次新闻商品性的讨论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8): 152-156.
- [66] 李良荣, 沈莉. 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J]. 新闻大学, 1995(2): 6-8.
- [67] 李良荣, 戴苏苏. 新闻改革30年: 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J]. 新闻大学, 2008(4): 1-5.
- [68] [加]赵月枝. 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J]. 经济导刊, 2014(7): 45-50.
- [69] 尹连根, 王海燕. 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J]. 当代中国研究, 2007(2).
- [70] 程天敏. 我看“社会大特写”[J]. 新闻界, 1998(2): 16-17.
- [71] 熊蕾. 报, 还是不报? ——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EB/OL]. 华声在线“熊蕾的博客”, 2008-01-06,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309>.
- [72] 贾亦凡, 陈斌, 阿仁. 2008年十大假新闻[J]. 新闻记者, 2009(1): 4-13.
- [73] 郑保卫, 陈绚. 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调查报告[J]. 新闻记者, 2004(5): 20-22.
- [74] 陈力丹. 2004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J]. 新闻界, 2005(1): 9-12.
- [75] 陆晔, 潘忠党. 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 新闻学研究(台湾), 2002(2): 46.
- [76] 何梓华. 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出版自由[M]//中国新闻学会. 新闻自由论集.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88: 139-159.
- [77] 王维佳. 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J]. 新闻记者, 2015(1): 15-20.
- [78] [加]赵月枝.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J]. 新闻大学, 2008(2): 9-16.
- [79] 赵汀阳. 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J]. 文化纵横, 2013(4): 81-91.
- [80] [美]弗雷德·布洛克. 《大转型》导言[M]// [英]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81] 王绍光. 波兰尼的《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 [82]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大转型》前言[M]// [英]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

- [83] 欧树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J]. 文化纵横, 2014(4): 27-32.
- [84] 《文化纵横》编辑部. 一个时代的落幕[J]. 文化纵横, 2014(4): 编辑手记.
- [85] 林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J]. 领导者 2010(8).
- [86] 谢泳. 关于沈崇事件的一些历史材料[M]//李公明. 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101.
- [87]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Z]. 2006-01-24.
- [88] 李小佳. 不能以猎奇的心态读党史——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N]. 解放日报, 2013-10-31.
- [89] 陈独秀.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N]. 努力周报, 1922-09-03.
- [90] 高波. 文学课重现代轻当代讲偏了[N]. 环球时报, 2014-08-16.
- [91] 何满子. 这不是反了么? [J]. 文学自由谈 2006(2): 22-26.
- [92] 所思. 只谈风月, 不谈风云? [J]. 读书 2008(4): 52-56.
- [93] 王芳. 新的时代仍需歌唱英雄[N]. 环球时报 2014-06-13.
- [94] 黄平. 诉诸群众, 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J]//《经济导刊》编辑部. 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二). 经济导刊 2014(6): 8-16.
- [95] 马献忠. 我只是新闻规律的探索者——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甘惜分[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09-25.
- [96] 温儒敏. 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J]. 文艺争鸣 2007(7): 51-55.
- [97] 赵汀阳. 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N]//陈明 朱汉民. 原道(第十五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79.
- [98] 蒋云鹤. 唱响中国 增强崛起正能量——专访《道路自信: 中国为什么能》作者玛雅[J]. 决策与信息 2014(5): 16-27.
- [99] 玛雅. 中国之路: 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专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J]. 决策与信息 2012(11): 8-19.
- [100] 庄重. 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 炎黄春秋 2009(7): 23-25.
- [101]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人物志(第66卷)[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492-493; 高放. 再谈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起草者. 炎黄春秋 2011(1): 93.
- [102] 刘倩. 文献 党史 党校发言人就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答记者问[EB/OL].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05-25,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0/14738280.html>.
- [103] 夏斌. 所谓“还原”, 不能偏离历史大方向——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些历史研究和传播现象谈(上)[N]. 解放日报 2012-08-08.
- [104]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03-18.
- [105] 王维佳. 中国媒体如何报道曼德拉逝世[EB/OL]. 新浪博客“清华大学王维佳的博客” 2013-12-0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b4ffcc0101fh7v.html; 王维佳. 中国媒体曼德拉逝世报道的问题[J]. 青年记者 2014(1): 31-33.
- [106] 李玲. 解决中国的问题, 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J]//《经济导刊》编辑部. 话语自信与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国媒体现状检讨(三). 经济导刊 2014(7): 34-38.
- [107] 任仲平. 文化“为人民”的历史跨越 创作源于人民[N]. 人民日报 2012-05-22.
- [108]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 人民日报 2014-10-16.
- [109] 江晓原. 科学外史 II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110] 潘维玛雅.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0: 221.
- [11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方网站 2014-03-05,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3/t20140305_46240.htm.
- [112] 郑永年. 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 [113] 王晶. 最美好的时代? 最糟糕的时代? ——对崛起的中国互联网络民意的反思[J]. 新闻记者 2015(1): 21-26.
- [114] 王维佳 杨丽娟. “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J]. 开放时代 2012(5): 48-62.
- [115] 苗伟山. 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 基于媒体多元互动的分析路径[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7): 49-64.
- [116] 黄纪苏. 闲话国企改革[J]. 国企 2012(11): 111.
- [117] 潘维.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J]//《经济导刊》编辑部. 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二). 经济导刊 2014(6): 8-16.
- [118]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第二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84.
- [119] 强世功. 中国香港: 文化与政治的视野[M]. 北京: 三

- 联书店 2010: 119.
- [120] 江晓原. 随缘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281-290.
- [121] 玛 雅. 中国未来 30 年的愿景与挑战——专访潘维[J]. 红旗文稿 2013(23): 4-9.
- [122] 《经济导刊》编辑部. 中国媒体现状检讨[J]. 经济导刊 2014(5): 18-26.
- [123] 《经济导刊》编辑部. 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二) [J]. 经济导刊 2014(6): 8-16.
- [124]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新华社 2013-12-26.
- [125] 朱继东. 该对改革开放做历史总结了[N]. 环球时报, 2013-11-09.
- [126] 卢周来.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选择[J]. 文化纵横 2014(4): 34-44.
- [127] [法]路易·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陈 越.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338.
- [128] [意]弗朗科·里沃尔西. 葛兰西与左翼的政治文化[M]//[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黄华光, 徐力源,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13.

A New Era: An Essa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ety and Journalism

LI Bin^{1 2}

- (1.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re seems to be a brief trilogy in the social change and journalistic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tensive politicization in the 1980s, the formation of de-politicized policy in the 1990s, and the re-politicized process in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ide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ortuous, arduous evolution of China's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transmission since the e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Furthermore, complex social backgrounds have been brought togeth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This paper aims to sketch the outline of this evolution rooted in a broader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 outline including ideological trajectories, tracks of media coverage and according social contexts.

Key words: social changes; journalistic transformation; politicized culture; de-politicization

(责任编辑 李雪枫)